

由龍柄器皿談北朝至唐代陶瓷 製作的模件運用*

林郡儀**

提 要

帶有龍柄的壺與瓶是北朝到唐代陶瓷中相當具有特色的器皿類型，經常作為文化交流的代表器物。過去研究對於各器形源頭有豐富研究，本文則聚焦於彼此關聯，以了解其在中土的發展。首先從流行時代、區域、功能、象徵意義重新檢視彼此關聯，特別針對過去對雞頭壺和雙龍柄壺之間線性演變關係的爭議。繼而借重雷德侯提出的模件體系，從作坊的角度說明許多過去鮮少與龍柄器皿相提並論的器形，其實與之使用相同的模件。之後探討模件生產思維在設計各種龍柄器形時的作用。在外來器形的刺激下，陶工可能以既有模件回應，外來器形也能為模件庫提供新模件以供陶工搭配舊模件產生新組合。這樣的生產與設計思維顯示，探討器形之間的關聯時，除了從整體器形入手，也需要由模件層次切入。此角度為積極建立線性演變關係的作法提供省思，同時有助於洞察文化交流中在地化的背後機制。

關鍵詞：龍柄、陶瓷、模件、作坊、在地化、鞏義窯

* 收稿日期：2025年6月26日；通過刊登日期：2026年1月16日
本文為國科會研究計畫「由區域互動角度重思唐墓兩京樣式的發展」(NSTC 113-2410-H-002-268-MY3)部分成果。個別案例曾分別發表於2017年EAAA、2018年AASA、2019年AAS以及2025年舉行於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的“International Symposium: Decentering the East Asian Mediterranean: Moving Artists, Artefacts, and Concepts”承蒙與會師長學友與本稿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的建議，特申謝忱。惟文中若有任何錯漏，由作者自負文責。

** 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助理教授

一、前言

流行於唐代前期的雙龍柄壺是中古中國最受矚目的陶瓷器形之一，國立故宮博物院的藏品是典型代表（圖 1a）。此器主體為一平底倒卵形身，上接帶盤口的細頸。最顯眼的特徵是高過口沿的雙柄，裝飾於頂端的神獸被辨識為「龍」，是器形命名依據。¹ 龍身由雙股泥條組成，背後裝飾泥團捏成的乳丁，頭部則貼塑雙股細泥條塑成的大卷鬚，並添加如意雲形裝飾、耳朵、下顎等細節（圖 1b）。雙龍背脊挺立，高過器身口沿，之後低垂銜住盤口。除了龍，也有以鳳鳥和獸裝飾把柄的案例。謝明良提出以「雙獸柄壺」概括此類器形，除了更合乎當前考古發現，也彰顯龍柄可受代換的性質。² 龍柄也能搭配其他構件形成多樣器形。例如與雙龍柄壺流行時代重疊的瓣口瓶（圖 2），是一種口沿捏塑成花瓣狀的單柄器皿，也用龍柄裝飾。若再將時代拉長，能看到更多不同的龍柄器形，例如雞頭壺（圖 3）、雙身雙龍柄壺（圖 4）、環形壺（圖 5）、象首壺（圖 6）等。這些器形均有龍柄，甚至能夠見到兩件不同造型的器物採用相似龍柄的案例。

雖然上述器皿都帶龍柄，但討論時，往往注重追溯各自的源頭。而多數龍柄器皿都可追溯至外來器形。學者普遍同意瓣口瓶源自「胡瓶」這種帶單把、梨形或球形器身、瓶口形塑為流嘴的器形。³ 此類器形流行於地中海地區與歐亞草原，一直到東北亞的韓半島、日本群島都能看到，除了陶瓷，還有玻璃、金銀器以及漆器等各種材質。⁴ 不同流嘴造型可能來自不同材質，例如瓣口可能模仿自玻璃

1 此類器物有多種名稱，如「雙龍耳瓶」、「雙龍柄壺」、「雙龍柄尊」等。

2 謝明良，〈唐咸亨年（670-674）的陶瓷景觀〉，《故宮學術季刊》，42 卷 1 期（2024 秋），頁 13。

3 亀井明德，〈隋唐弁口瓶・鳳首瓶・銀瓶の形式と年代〉，收入同氏著，《中国陶瓷史の研究》（東京：六一書房，2014），頁 199-201；齊東方，〈輸入・模仿・改造・創新——粟特器物與中國文化〉，收入榮新江、張志清編，《從撒馬爾干到長安——粟特人在中國的文化遺跡》（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頁 30-31；Jessica Rawson, "Central Asian Silver and its Influence on Chinese Ceramics,"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5 (1991): 142-147. 中譯見羅森 (Jessica Rawson), 鄭善萍譯, 〈中亞銀器及其對中國瓷器的影響〉, 收入同氏著, 《中國古代的藝術與文化》(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2), 頁 241-257; Jessica Rawson, "Inside Out: Creating the Exotic within Early Tang Dynasty China in the Seven and Eighth Centuries," *World Art* 2 (2012): 26-27, 36-38. 中譯見 Jessica Rawson, 林容伊、許涵譯, 〈由內象外: 7-8 世紀的唐代中國對於異國風格的造作〉, 《典藏讀天下·古美術》, 6 期 (2014.9), 頁 58-65; Yi Chen, "Chapter Seven: Platters with Teeth and Ewers Lifted from One Side: New Vessel Forms and Foodways in Tang China (618-907)," in *Visual, Material and Textural Cultures of Food and Drink in China, 200 BCE-1900 CE*, ed. Stacey Pierson (Newcastle upon Tyn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22), 184-237.

4 參見日本奈良正倉院藏漆胡瓶（北倉 43），名稱記載於天平勝寶八年（756）〈國家珍寶帳〉。圖版見〈漆胡瓶〉，《正倉院宝物檢索》<https://shosoin.kunaicho.go.jp/treasures?id=0000010145&index>

器。⁵對於龍柄環形壺，則回溯至地中海的環形壺。⁶象首壺被認為源自犍陀羅地區。⁷雙龍柄壺則上追至地中海到中亞一帶的雙柄壺，包含金屬器、陶器、玻璃器，但帶三支龍柄的則指向三柄壺。⁸

上述器形都能找到外來源頭，然而，一些器形的出現無法完全以外來因素解釋，雙龍柄壺便是其中之一。雞頭壺與雙龍柄壺造型相似度高，兩者均有倒卵形身、細頸、盤口和高於器口的龍柄。唯一的差別在於雞頭壺上與龍柄相對的是一個雞首，而非另一隻龍柄。同樣帶有盤口和龍柄的還有雙身雙龍柄壺。基於流行年代的順序與特徵上的相似，學者建立了「雞頭壺→雙身雙龍柄壺→單身雙龍柄壺」的線性演變關係。⁹這樣的單線序列受到廣泛接受，但難以解釋雙身雙龍柄壺的出現，龜井明德因此認為應考慮雙身雙龍柄壺和雙龍柄壺並存的複線，但目前學界仍保留不同看法。¹⁰趙德雲於2007年以雞頭壺演變說為主軸，認為不同階段受到不同的西方刺激產生不同變化。當中也提及雞頭壺等器皿把手接在口沿上端的作法來自胡瓶。¹¹然而，有許多同樣帶有龍柄的盤口壺依舊未能排入序列，例如山西太原隋開皇十五年（595）梅淵墓的三繫龍柄壺（圖7）。

=22（檢索日期：2025年5月10日）

- 5 Regina Krahl, "Reflections of Roman Glass in Tang Ceramics," *Journal of Inner Asian Art and Archaeology* 2 (2007): 89-90; 林容伊,〈唐宋陶瓷與西方玻璃器〉(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頁58-59。
- 6 葛承雍,〈環形壺:從地中海到大興城——西安隋墓出土環形壺(askos)藝術研究〉,《文物》,2020年1期,頁58-62、66。
- 7 張琨林,〈南北朝陶瓷金屬工藝:以響銅為中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9),頁105-114。
- 8 謝明良,〈關於唐代雙龍柄壺〉,原載《故宮文物月刊》,278期(2006.5),後改寫收入同氏著,《陶瓷手記——陶瓷史思索和操作的軌跡》(臺北:石頭出版社,2008),頁61-63;林容伊,〈唐宋陶瓷與西方玻璃器〉,頁58-59;Margaret Medley, *The Chinese Potter: A Practical History of Chinese Ceramics* (Oxford: Phaidon, 1980), 84-85; Shelagh Vainker, *Chinese Pottery and Porcelain* (London: The British Museum, 2005), 43, 45; William Watson, *Tang and Liao Ceramics*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03; Rawson, "Central Asian silver and its Influence on Chinese Ceramics," 140, 142; Regina Krahl, "Reflections of Roman Glass in Tang Ceramics," 90。
- 9 傳統序列說明請見龜井明德(龜井明德),王淑津譯,〈隋唐龍耳瓶的形式與年代〉,《美術史研究集刊》,6期(1999.3),頁60。此文後改寫增補以日文發表,演變序列請見龜井明德,〈隋唐期龍耳瓶の形式と年代〉,收入同氏著,《中國陶瓷史の研究》(東京:六一書房,2014),頁122-124。
- 10 龜井明德,〈隋唐期龍耳瓶の形式と年代〉,頁139;謝明良,〈關於唐代雙龍柄壺〉,頁67-68、71。傳統路徑仍受支持,見徐巍、董健麗,〈唐代雙龍柄尊探究——以故宮博物院藏品為例〉,《故宮學刊》,2015年3期,頁226-227。
- 11 趙德雲,〈從雞頭壺到龍柄壺的發展:兼析外來文化因素在這一過程中的作用〉,《考古與文物》,2007年1期,頁100。

在溯源過程中，不少學者已經意識到兩種說法各有限制，並點出可能的突破方向。Rawson 因遲遲無法找到滿意的金屬實例，在 2012 年時以三彩作品發想，認為雙龍柄壺、鳳首壺等器形的出現未必模仿自單一金屬器形，而是唐代陶工雜揉多種器形的創新。¹² 謝明良指出盤口龍柄壺造型在隋代幾經試驗，初唐時單身雙龍柄壺成爲定制。¹³ 龜井明德認為龍柄雞頭壺和雙龍柄壺的使用脈絡不完全相同，因此也不排除雙龍柄壺屬於唐代出現的新明器，只是造型繼承既存傳統。¹⁴ 學者看法顯示，過去僅以器形整體爲單位建立線性發展軌跡的做法需要修正。此外，除了器形，也需要考慮使用脈絡以及生產與設計意匠。

本文延續這些提示提出下列問題：應該如何理解各種龍柄器皿與相關器形間的關聯？龍柄器皿之間的關聯反映出中古陶瓷產業的何等樣貌？展現出什麼樣的時代變遷與區域交流？探討這些問題除了了解中古時期的陶瓷發展，還能達到兩項目的。首先，各種龍柄器皿在南北朝到唐代陶瓷研究上深受關注，經常作爲文化交流的代表。Rawson 在《蓮與龍：中國紋飾 (Chinese Ornament: The Lotus and the Dragon)》一書中以建築石刻與各種材質的器皿說明魏晉南北朝到唐代，新的裝飾系統與母題隨著佛教西來，在中土扎根，開啓裝飾史上新的一頁。¹⁵ 不僅紋飾，此時期也是外來器形進入中土的重要時代，探討各種龍柄器皿間的關聯有助於了解文化交流中在地化的背後機制。其次，當前面對帶有類似特徵的器物時，積極建構線性演變關係仍爲常見做法。本文將以龍柄器皿間的關聯作爲個案研究，重新省思這項作法的適用範圍，並探索其他可能性。

爲達上述目的，本文首先由分布與流行時代以及功能和象徵意義的異同，重新檢視各樣龍柄器皿的關聯。其次，藉著窯址與墓葬出土的各式龍柄器皿，還原龍柄與其他模件在作坊的運用。最後，將各式龍柄器皿的具體器形抽象化爲構圖進行思考，討論陶工構思新器形的可能思維，並探索此時期的陶工面對大量來自域外與其他生產中心的設計時，如何有效率地吸納、轉化、創造出受當地贊助者歡迎的器形。

12 Rawson "Inside Out," 26-27. 學者對響銅案例有不同意見，見齊東方，〈唐代銅器皿簡論〉，《文博》，2005 年 2 期，頁 34-35；謝明良，〈關於唐代雙龍柄壺〉，頁 54。

13 謝明良，〈關於唐代雙龍柄壺〉，頁 61。

14 龜井明德，〈隋唐期竜耳瓶の形式と年代〉，頁 122-124。

15 Jessica Rawson, *Chinese Ornament: The Lotus and the Dragon* (New York: Holmes & Meier Publishers, 1984), 9-88. 中譯見杰西卡·羅森 (Jessica Rawson)，張平譯，《蓮與龍：中國紋飾 (Chinese Ornament: The Lotus and the Dragon)》(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9)，頁 1-62。

二、龍柄器皿關聯再探

(一) 流行時代與區域

為求精確掌握出土地點以及使用和製作等資訊，本文以發表於考古報告的出土品為主要研究對象。此外，為求聚焦，僅討論器柄塑為龍上半身且不塑四肢的器類。綜合考慮各種龍柄器形出現的時間，其發展可分為六世紀、六世紀末到七世紀初、七世紀下半三個階段。在這三個階段中，類型種類從單一，到多樣，再減少。

六世紀以龍的上半身為柄的器形稀少，以龍柄雞頭壺為主流。此器形主體為一倒卵形身，細頸，盤口，平底，器身一側裝飾雞首形的流，另一側安有一支高過口沿後向下連接口沿的柄。此器形先流行於南方，早期並無龍首裝飾。¹⁶ 北方最晚在六世紀初，也就是北魏洛陽時期開始燒造雞頭壺，一開始便以帶有龍柄的造型為大宗。¹⁷ 和南方不同，北方流行肩部線條渾圓的卵形身與帶尖喙的雞首。出土龍柄雞頭壺的北魏墓集中於都城洛陽，然而，到了六世紀下半，集中出土龍柄雞頭壺的是作為北齊陪都的晉陽（今山西太原），有天統三年（567）韓裔墓、¹⁸ 武平元年（570）婁叡墓、¹⁹ 武平二年（571）徐顯秀墓（圖8）……等等。²⁰ 其他地區不多見，就連作為首都和高等級墓葬集中地的鄴城地區（今河北邯鄲和河南安陽地區）也是，就筆者掌握，鄴城紀年出土品目前僅見武平七年（576）高潤墓一例。²¹

16 謝明良，〈雞頭壺的變遷——兼談兩廣地區兩座西晉紀年墓的時代問題〉，收入同氏著，《六朝陶瓷論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社，2006），頁329。

17 謝明良，〈雞頭壺的變遷——兼談兩廣地區兩座西晉紀年墓的時代問題〉，頁330-331。目前僅有西安北魏韋氏家族墓中韋輝和墓和韋乾墓的出土品不見龍柄，而這兩件出土品的產地目前在討論。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西安南郊北魏北周墓發掘簡報〉，《文物》，2009年5期，頁46-47；魏女，〈西安北魏韋氏紀年墓出土瓷器及相關問題探討〉，《考古與文物》，2020年3期，頁92-95。

18 墓誌僅記韓裔卒於北齊天統三年（567），未記葬年。陶正剛，〈山西祁縣白圭北齊韓裔墓〉，《文物》，1975年4期，頁67-68。

19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齊東安王婁叡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頁137-138。

20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太原北齊徐顯秀墓發掘簡報〉，《文物》，2003年10期，頁13-14、30；龜井明德，〈隋唐期竜耳瓶の形式と年代〉，頁121-122。

21 磁縣文化館，〈河北磁縣北齊高潤墓〉，《考古》，1979年3期，頁241。鄴城北邊的河北河間也有出土品，目前定為北齊產品，但柄首有修補痕跡，暫不列入討論，見張柏主編，《中國出土瓷器全集·3·河北》（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頁15。

今山東境內偶見出土案例，但多損毀，暫不列入討論。²² 上述歸納顯示，雖然山西目前沒有發現生產龍柄器皿的窯址，但從分布看來，六世紀下半時，北齊晉陽是最主要的生產與使用中心。

六世紀末到七世紀初墓葬出土的龍柄器皿造型多樣，有雞頭壺、其他帶龍柄的盤口壺、雙身雙龍柄壺、象首壺、環形壺等等。可說與龍柄搭配的部件更為多元。由於出自紀年墓的物件不多，大多數需靠比定紀年墓出土品定年。

龍柄雞頭壺持續使用，但分布地點與細微特徵有所改變。雖然山西的隋代紀年墓尚未發現，河北邯鄲與河南安陽一帶的隋墓亦未見報導，不過，安陽麴慶墓（590）的石門額刻有龍柄雞頭壺圖像（圖9），顯示當地人對此器形不陌生。²³ 另一方面，原本不見龍柄雞頭壺的地區開始有發現，例如陝西西安隋大業元年（605）李裕墓和大業四年（608）李靜訓墓（圖3）。²⁴ 兩件均為白瓷作品，雞首拉長，強調頸部曲線。李靜訓墓的陰刻頸部羽毛。器身在下腹內收後緩緩外撇形成足部。此為隋代特色，也見於同墓出土的盤口壺。

這類足部外撇的龍柄雞頭壺流行至長江流域，在湖北和江蘇都有發現。湖北武漢東湖岳家嘴 M29 出土兩件龍柄雞頭壺（圖10），²⁵ 武昌周家大灣 241 號隋墓出土三件；²⁶ 江蘇揚州郭莊隋墓 M1 和 M2 各出土一件（圖11、12）。²⁷ 這四件在圓潤的倒卵形身和外撇的足部上和李靜訓墓的出土品相似，但和東晉南朝常見的產品差異較大，很可能是以隋代北方產品為模仿對象。江蘇揚州郭莊 M1 的出土品

22 山東臨朐北齊天保二年（551）崔芬墓也出土雞首壺，但柄的上段與相應的口沿斷裂，無法判斷是否有龍首。1973年首次發掘的臨淄崔氏墓地 M7 依陶俑造型定為東魏墓，墓中出土一件「白陶螭首壺」，流處破裂，無法得知是否有雞首。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臨朐縣博物館，〈山東臨朐北齊崔芬壁畫墓〉，《文物》，2002年4期，頁6；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臨淄北朝崔氏墓〉，《考古學報》，1984年2期，頁239-240，圖版26之5；淄博市博物館、臨淄區文管所，〈臨淄北朝崔氏墓地第二次清理簡報〉，《考古》，1985年3期，頁217。

23 安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安陽隋代麴慶夫妻合葬墓的發掘〉，《考古學報》，2023年3期，頁396。

24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南郊隋李裕墓發掘簡報〉，《文物》，2009年7期，頁11、13；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唐長安城郊隋唐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頁13。

25 武漢市文物管理處，〈武漢市東湖岳家嘴隋墓發掘簡報〉，《考古》，1983年9期，頁797-798。

26 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武漢市郊周家大灣 241 號隋墓清理簡報〉，《考古通訊》，1957年6期，頁32、圖版10之10。

27 發掘者結合墓葬形制、墓中出土陶瓷器皿造型以及判斷為隋五銖的銅錢，認為江蘇揚州郭莊 M2 為隋墓。雖然此墓出土的雞頭壺柄經過修補，但可以看出原本貼塑龍頭，盤口靠器柄一側黏貼的泥片為其下顎。揚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蘇揚州郭莊隋代墓葬發掘簡報〉，《東南文化》，2017年4期，頁52-53、59。

與北方的產品在造型上尤為接近，不排除為北方產品。江蘇揚州郭莊 M2 與湖北三件出土品的頸部相對粗且直，和北方出土品差異較大。

謝明良由造型裝飾特徵判斷湖北武漢東湖岳家嘴 M29 與武昌周家大灣 241 號隋墓的出土品可能為兩湖地區產品。²⁸ 江蘇揚州郭莊 M2 的出土品也可能產於南方。此壺的壺身以兩道陰刻弦紋分為三段，上段以陰刻線劃出覆蓮瓣紋，中段戳印一圈由七個圓圈和外圍放射狀短線組成的圖案，下段為仰蓮瓣紋。類似的模印和刻劃紋飾也出現在江蘇泰州出土的青釉劃花十繫罐（圖 13）。²⁹ 這件十繫罐出土時裝有「太建六銖」兩枚，此錢幣為南朝陳宣帝太建十一年（579）年鑄造，學者因此將這件罐的年代定於陳末。³⁰ 雖然中段的戳印文圖案中心有所不同，但從刻劃痕跡看來，均先刻劃構成兩相鄰蓮瓣側邊的直線，之後刻劃或模印蓮瓣尖端，構成蓮瓣側邊的陰刻線經常超過蓮瓣頂端的下緣。紋飾與製作手法上的相同，顯示兩件雞頭壺和劃花十繫罐來自同一個生產中心。安徽無為（圖 14）曾出土一件與江蘇揚州郭莊 M2 雞頭壺幾乎一模一樣的作品，唯一不同的是繫的方向，但繫的造型和數目相同。³¹ 有學者認為無為出土的雞頭壺產自同樣位於安徽的壽州窯。³² 然而，考慮其與揚州出土雞頭壺和十繫罐的相似性，也需要考慮產自江蘇一帶的可能性。這些例子展現南方生產北方樣式龍柄雞頭壺的情形。

六世紀末還出現形似雞頭壺但改以其他裝飾替代雞首的案例。山西汾陽梅淵墓出土的三繫龍柄壺（圖 7），以豎向雙股環形繫下面加假鉚釘代替雞首。³³ 另一個以環形繫代替雞首的案例出自甘肅天水屏風石棺床墓。³⁴ 安徽長豐隋墓的出土品則是省略雞首（圖 15）。³⁵ 定為隋代的山東泰安舊縣徵集品則以蹲猴替代雞首（圖 16），雖然出土脈絡不明，但把手上的乳丁為唐代龍柄的重要特徵，故納入討論。³⁶

28 謝明良，〈雞頭壺的變遷——兼談兩廣地區兩座西晉紀年墓的時代問題〉，頁 332。

29 張柏主編，《中國出土瓷器全集·7·江蘇、上海》（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頁 63。

30 張柏主編，《中國出土瓷器全集·7·江蘇、上海》，頁 63。

31 張柏主編，《中國出土瓷器全集·8·安徽》（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頁 53。

32 胡悅謙認為可能是壽州窯產品。詳見胡悅謙，〈談壽州窯〉，《考古》，1988 年 8 期，頁 743。

33 山西省博物館、汾陽縣博物館，〈山西汾陽北關隋梅淵墓清理簡報〉，《文物》，1992 年 10 期，頁 23-24。

34 此器器柄已斷，發掘者將留在口沿的殘柄上的動物判斷為雞。不排除是如李靜訓墓雞頭壺上較接近禽類的龍柄，但由於圖版模糊，難以精確判斷其形象以及頭上是否有如意雲與卷鬚。

35 張柏主編，《中國出土瓷器全集·3·河北》，頁 21；胡悅謙，〈談壽州窯〉，頁 743。

36 程繼林，〈泰安舊縣出土的隋代青瓷龍柄蹲猴壺〉，《文物》，1988 年 8 期，頁 95；亀井明德，〈隋唐期竜耳瓶の形式と年代〉，頁 123。

雙身雙龍柄壺主體由兩個小型倒卵形身構成，配上帶盤口的長頸，兩側加飾龍柄，有些作品上有繫，有些沒有。在陝西西安李靜訓墓（圖4）和河南洛陽宮城遺址（圖17）有出土案例。³⁷ 此類器形的年代定於隋代，因為僅有的一件紀年器出土於隋李靜訓墓，且此器形尚未在北朝或唐代紀年墓中發現。由於出土案例稀少，研究多將博物館藏品納入討論。出土地相對明確的是安徽省博物館的藏品（圖18），胡悅謙判斷其產自安徽壽州窯。³⁸ 墓葬出土品和博物館藏品顯示此類器形有轆轤拉坯成形與模印成形兩種。李靜訓墓的出土品為拉坯而成，壺身光素無紋，只簡單劃出兩道雙陰刻弦紋，頸上也有三道凹弦紋。洛陽宮城遺址出土品則是模製成形的代表，成形的同時印有聯珠紋等裝飾，之後上綠色鉛釉。李靜訓墓的白瓷雙身雙龍柄壺和雞頭壺共伴出土，胎釉特徵與龍柄造型都一樣，應出自同作坊。

相較於上述器形，其他器形少見。目前發現的環形壺只有兩件，無紀年器，兩件器物均定於隋代。³⁹ 河南新鄉的出土品（圖5）保存完整，帶有盤口、細頸、環形身以及高足，身側分別為雞首與龍柄，盤口下方有四個繫。陝西西安東郊昆侖社區十六街坊建設工地隋代夫妻合葬墓的出土品與之大同小異，但足形略有不同，且環形身上印有葡萄與童子紋飾（圖19）。右側的裝飾已經斷裂，但從河南新鄉的出土品推測，此側的裝飾應為雞首。兩件環形壺的龍柄均高過盤口。龍的頭上均有卷鬚，身體由兩股泥條組成，低頭銜著口沿，這些特徵也能在北朝到隋的雞頭壺和雙身雙龍柄壺上看到。

此外，還有張盛墓出土的象首壺（圖6）。⁴⁰ 此壺目前為出土品中的孤例。壺身為蘋果形，壺肩上有八個縱向的繫。器身上有細頸，頸部上端外敞形成像盤口的部位，但盤口並非敞開的，而是內收後有一根細長管狀流。壺身一側是做成象頭的流，象鼻向上拗，這兩點更近似一般淨瓶。⁴¹ 另一側為龍柄，頭上頂著卷鬚，

37 千賀久、林部均編，《遣唐使が見た中国文化：奈良・藤原京建都千三百年》（四日市：四日市市立博物館，1995），頁65。

38 胡悅謙，〈談壽州瓷窯〉，頁744。

39 葛承雍，〈環形壺：從地中海到大興城——西安隋墓出土環形壺（askos）藝術研究〉，頁58-62、66。

40 張柏主編，《中國出土瓷器全集·12·河南》（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頁30。

41 中國境內出土不少將器身的流做成象鼻的淨瓶，例如1975年江西新建的出土品。雖然象的鼻子也向前伸而非向上，但為張盛墓器形源頭提供更多線索。陳柏泉，〈記新建隋墓出土的單

銜著壺頸上端像盤口處但內收的部位。

上述六世紀末到七世紀初墓葬出土的許多器形在七世紀下半幾乎不見。由於隋末到貞觀早期墓葬發表甚少，缺乏材料尤其是可靠的紀年標本，因此學界對這個區間的發展了解有限。⁴² 不過，一件出土於河北石家莊的龍柄盤口壺（圖 20）不論器形還是其上的繫，都和李靜訓墓的龍柄雞頭壺相似，但龍柄的特徵更接近流行於七世紀下半的雙龍柄壺，不排除為此時期作品。⁴³

到了七世紀下半，盛行的器形為雙龍柄壺和瓣口瓶，雞頭壺偶有出土案例，但造型衰微。

值得一提的是雞頭壺，七世紀下半的雞頭極小且柄上動物的製作相當隨意，不僅和以往雞頭壺的龍柄造型相異，也和當代盛行龍柄樣式乃至其他獸柄樣式大相逕庭。紀年器有陝西西安唐總章元年（668）李爽墓的出土品（圖 21）。⁴⁴ 由於出土品不多，因此需考量傳世品。傳世品主要是三彩器，且造型類似。⁴⁵ 將三彩器的流行時間納入考量，顯示此造型的雞頭壺流行於七世紀下半甚至到八世紀上半。

至於雙龍柄壺這樣的新興器形，採用的是碩大且製作精細的龍柄。考古出土品顯示雙龍柄壺主要分布於作為唐代兩京地區的長安（今陝西西安）與洛陽（今河南洛陽）及周邊地區。⁴⁶ 由紀年墓看來，最早的作品為唐咸亨年間，出土於河南洛陽的唐咸亨元年（670）張文俱墓與陳暉墓，最晚的則是河南鞏義唐天寶五年

持》，《江西歷史文物》，1985 年 2 期，頁 41-42；張琨林，〈南北朝陶瓷金屬工藝：以響銅為中心〉，頁 106。

42 穆青說明邢台曹演莊大業六年（610）墓也出土「白瓷雙龍柄壺」，但墓葬詳情尚待披露，且從照片看來，其形制與七到八世紀典型樣本相似，見穆青，〈青瓷、白瓷、黃釉瓷——試論河北北朝至隋代瓷器的發展演變〉，收入河北省邢台市文化管理處編著（石從枝、李軍、李恩璋、王睿主編），《邢台隋代邢窯》（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頁 334。龜井明德將有龍柄下與頸下有貼花、頸部帶多道弦紋且尺寸在 50 公分以上的大型品視為最古式的龍柄壺，年代可能上至隋到初唐，日本出光美術館藏雙獸柄壺也在其列，見龜井明德，〈隋唐期竜耳瓶の形式と年代〉，頁 133-137。近年河南洛陽洛龍區唐墓 C7M6915 出土和出光美術館藏品幾乎一模一樣的雙獸柄壺，但此墓未見墓誌，發掘報告見洛陽市考古研究院，〈河南洛陽洛龍區唐墓 C7M6915 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23 年 3 期，頁 30-37。

43 張柏主編，《中國出土瓷器全集·3·河北》，頁 21。龜井明德也將此作品納入唐代雞頭壺的衰微作品討論，見龜井明德，〈隋唐期竜耳瓶の形式と年代〉，頁 124。

44 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西安羊頭鎮唐李爽墓的發掘〉，《文物》，1959 年 3 期，頁 44。

45 龜井明德，〈隋唐期竜耳瓶の形式と年代〉，頁 124。

46 謝明良，〈關於唐代雙龍柄壺〉，頁 55-58。

(746) 吳興郡戶參軍墓。⁴⁷ 主要盛行年代是七世紀下半到八世紀上半，也就是安史之亂前的唐代。在已知物件中，不論考古出土品或者博物館藏品的雙龍柄壺造型均與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大同小異，只是尺寸跨度大。⁴⁸

龍柄瓣口瓶目前有明確出土資訊的不多，僅見於河南和陝西。河南鞏義城西變電站出土的瓣口瓶主體為帶器足的梨形身、細頸、花口，上有貼花裝飾(圖 2)。⁴⁹ 陝西西安三橋村也出土一件，器形相似，但更為高瘦，同樣以貼花裝飾(圖 22)。⁵⁰ 雖不見紀年器，但各大博物館的藏品有不少為三彩，顯示此器形在七世紀下半到八世紀上半相當流行。

上述分析展現龍柄器皿類型由少而多再減少的過程。此外，不同類型的龍柄器皿續存時間不同，分布範圍也不同，顯示彼此的關係需要重新評估。以被視為有演變關係的雞頭壺和雙龍柄壺為例。雞頭壺在六到七世紀持續使用，其中，在六世紀末到七世紀初時分布擴大，且各地產品有自己的區域特色。雙龍柄壺則要到七世紀下半才大量出現，僅分布於唐代兩京，且造型相似度高。由於兩者分布的重疊地區為兩京，過去對雞頭壺「發展」為雙龍柄壺的假設，實際上只在兩京地區有成立的可能性。此外，假設是否成立還需要檢視，因為即便在兩京，雞頭壺並未因雙龍柄壺的出現而消失。⁵¹ 這顯示雞頭壺分布範圍縮小和器形特徵簡化與雙龍柄壺的創發可能出於不同原因。也就是說，雞頭壺的衰微以及雙龍柄壺乃至其他龍柄器皿的興起是獨立事件。不僅雞頭壺與雙龍柄壺間的關聯需要重新評估，兩者與同時代其他龍柄器皿間的關係也需要。

47 謝明良，〈唐咸亨年(670-674)的陶瓷景觀〉，頁 13；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唐代張文俱墓發掘報告〉，《中原文物》，2013 年 5 期，頁 12-13；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陽關林唐代陳暉墓發掘簡報〉，《中原文物》，2012 年 6 期，頁 6-7；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鞏義芝田唐墓發掘簡報〉，《文物春秋》，2013 年 2 期，頁 19。

48 龍柄雖有變體但為孤例，河南鶴壁王仁波墓(738)的出土品不僅帶高圈足，還將龍的尾巴和四肢都形塑出來。圖版參見王文強、霍保成，〈鶴壁市發現一座唐代墓葬〉，《中原文物》，1988 年 2 期，頁 33。

49 考古報告標示為「雞首龍柄壺(M17:3)」。鄭州文物考古研究院、鄭州考古博物館，〈鞏義城西變電站唐墓發掘簡報〉，《文物春秋》，2011 年 3 期，頁 33。

50 セゾン美術館、日本經濟新聞社編，《長安の秘宝：シルクロードの都：日中国交正常化 20 周年記念》(東京：セゾン美術館、日本經濟新聞社，1992)，頁 42。

51 亀井明德，〈隋唐期竜耳瓶の形式と年代〉，頁 124。

(二) 功能與象徵意義

學者對北朝到唐龍柄器皿的功能有不少推測。環形壺可能為酒器或者在寺院進香獻油時使用。⁵² 張盛墓出土的象首壺頂部形似淨瓶，再考慮象頭在佛教的象徵意義，以及此器有僧人俑共伴出土，不排除此壺為儀式用器。⁵³ 瓣口瓶與大部分帶盤口長頸的器形可能為日常用器，但考量大型器上龍柄難以支撐器身重量，有些物件可能為明器。雞頭壺在不同地區與時代的功能可能產生變化，且不排除在同時同地因為尺寸而有不同的使用方式。需要說明的是，目前龍柄象徵意義不明朗，因此先前研究討論龍柄器皿的象徵意義和功能時多聚焦於其他面向。雖然還有諸多未解之謎，但過去對雞頭壺和雙龍柄壺演變關係的建構，為分析關聯提供了立基點，以下從器形、紋飾與出土脈絡三方面透露出的使用方式與象徵意義重新檢視雞頭壺與雙龍柄壺關係。

北齊晉陽地區的雞頭壺在墓葬中相當普遍，雖然因為墓葬多遭受嚴重盜擾而無從得知擺放位置，但可以推估一座墓的出土數量以及共伴出土的器物類型，這些有助於評估雞頭壺與其他龍柄器皿使用方式的異同。婁叡墓在嚴重盜擾後仍出土五件龍柄雞頭壺，徐顯秀墓盜擾程度更甚，仍出土七件。在尺寸方面，北朝墓出土品多為大型品，徐顯秀墓的甚至高達 50 公分。⁵⁴ 基於龍柄不足以支撐器身重量加上位於流嘴部位的雞頭經常與器壁不通，可能為明器，但不排除下葬時器身盛有液體。⁵⁵ 在六世紀末到七世紀初，河南安陽隋開皇十年（590）麴慶墓石門額上的線刻有龍柄雞頭壺（圖 9）。⁵⁶ 在畫面正中，墓主夫婦在帳中的榻上相對而坐，享用飲食。面對畫面時男墓主在觀者右側，帳外是鞍馬；女墓主在左側，帳外是牛車。龍柄雞頭壺放在帳前的地上，提把旁有一個淺盆，說明這件雞頭壺很可能作為盥洗用器，但是否具儀式用意有待未來研究。陝西西安隋李靜訓墓雞頭

52 葛承雍，〈環形壺：從地中海到大興城——西安隋墓出土環形壺（askos）藝術研究〉，頁 67。

53 張琨林，〈南北朝陶瓷與金屬工藝：以響銅為中心〉，頁 108-114；張德水主編，〈安陽張盛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24），頁 38-41、142。

54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太原北齊徐顯秀墓發掘簡報〉，頁 14。

55 江蘇揚州郭莊隋墓 M2 雞頭壺即便龍柄殘損，高度仍達 46 公分，屬於大型品，其出土時口內有「T」形木塞，原先可能盛有液體，雖然屬於南方案例需要考慮區域差異，但仍值得參考。揚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蘇揚州郭莊隋代墓葬發掘簡報〉，頁 53。

56 麴慶妻韓氏下葬於隋開皇十八年（598）。發掘者以麴慶葬年為此墓紀年。安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安陽隋代麴慶夫妻合葬墓的發掘〉，《考古學報》，2023 年 3 期，頁 433。

壺為小型品（圖3），雞頭雖不具流嘴功能，但置於墓主頭部附近，周圍還有其他飲食用器，例如金高足杯、銀筷以及出土時裝有核桃的八繫瓷罐，不排除雞頭壺可能也盛裝液體或粉狀食材。⁵⁷ 在七世紀下半，雞頭壺依舊為小型品，但因李爽墓受盜擾，實際功能難知。

流行於唐代七世紀下半到八世紀上半的雙龍柄壺經常置於墓主頭部附近，與其他容器一同擺放，不排除下葬時盛有液體。有學者積極認為當中可能盛裝祭奠用酒。⁵⁸ 盛裝液體這點和雞頭壺相似。然而，雙龍柄壺經常成對出土，且似乎和七星盤及多施半截釉的短頸瓶有成套的組合關係。⁵⁹ 伴出器物的差異顯示雙龍柄壺的使用方式不同於雞頭壺和雙身雙龍柄壺。

再由意義來看。謝明良以文獻和南方雞頭壺的出土位置提示雞的辟邪功能。⁶⁰ 雖然無法確知傳到北方後是否維持辟邪功能，但從北齊墓的出土品均忠實形塑雞首這點看來，北齊的工匠與使用者相當重視這項特徵。此外，北齊墓的出土品經常在器身上部刻劃覆蓮紋。婁叡墓的鉛釉陶器除了覆蓮，還裝飾許多佛教石窟與墓葬常見的圖像與紋飾，如摩尼寶珠、忍冬紋，可能反映墓主的佛教信仰及其和喪家的期望。⁶¹ 婁叡墓的雞頭壺就有帶寶珠的長忍冬紋，或許也被賦予宗教意義。至於流行於唐代的雙龍柄壺，目前龍柄的象徵意義尚待掌握。⁶² 但若同意雞頭壺的雞首是有象徵意義的零件，就同意以龍柄替代雞首的雙龍柄壺在功能和象徵意義上不同於雞頭壺。再考慮目前在器形發展序列的定位上有爭議的雙身雙龍柄壺。此器形僅流行於六世紀末到七世紀初，只有小型品。除了在李靜訓墓中與雞頭壺同出，在洛陽宮城遺址也有發現，顯然出土地不限於墓葬，作用可能不限於喪葬。天津博物館藏品兩瓶底下有刻銘「此傳瓶，有並」，但與器形意義和功能間的關聯難解。⁶³ 儘管如此，仍能從雙身雙龍柄壺與雞頭壺伴出，且以另一只龍柄替代

57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唐長安城郊隋唐墓》，頁5-6、13-14、17-19。

58 董健麗，〈唐代雙龍柄尊及其相關問題〉，《中原文物》，2008年4期，頁63。

59 謝明良，〈唐咸亨年（670-674）的陶瓷景觀〉，頁14-15。

60 謝明良，〈雞頭壺的變遷——兼談兩廣地區兩座西晉紀年墓的時代問題〉，頁338-341。

61 河野道房，〈北齊婁叡墓壁畫考〉，收入礪波護編，《中國中世の文物》（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93），頁137-180；林聖智，〈圖像與裝飾——北朝墓葬的生死表象〉（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9），頁148-150。

62 有學者以博物館藏品墨書探討龍柄意義，見董健麗，〈唐雙龍柄尊〉，《文物世界》，2005年4期，頁52；董健麗，〈唐代雙龍柄尊及其相關問題〉，頁63。

63 千年邪黨編輯委員會編著（趙慶鋼、張志忠主編），《千年邪黨》（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

雞首，顯示其與雞頭壺間沒有取代關係。加上其伴出器物不同於雙龍柄壺，可進一步推斷三者的興衰為獨立事件。

那應該如何理解三者外觀上的相似性？筆者認為，以器形部件為分析單位能夠帶來新的視野。仔細觀察能發現，這幾種器形都是以預先製作的標準化零件接合而成，龍柄僅是其中之一。以隋代而言，葛承雍認為西安隋墓出土的環形壺和李靜訓墓出土的雞頭壺和雙身雙龍柄壺曾互相借鑒，是模件化生產下的產物。⁶⁴但三種器皿的使用脈絡和功能都未必相同。這組例子說明，部件的共享突破器形，甚至不受功能與使用脈絡限制，因此，需要回頭考量各器形在生產端的關聯並以器形部件的層次切入。

三、作坊中的模件集合

德國學者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萬物：中國藝術中的模件化和規模化生產（*Ten Thousand Things: Module and Mass Production in Chinese Art*）》一書中的「模件體系」提供了合適的分析依據。仔細觀察會發現，龍柄器皿都是以預先製作的標準化零件接合而成。這些包含龍柄在內的零件具有標準化、大量生產、可預先製備並相互代換用於組合的特色，正是《萬物》一書中的「模件」。⁶⁵

在模件體系中，工匠將數量有限的模件，搭配組合成多樣不同種類的成品。狹義的模件是指以實際的模子大量複製出的零件。這類模件彼此之間雖高度相似，卻非毫釐不差，例如畫像磚上的模印裝飾。⁶⁶有些刻意加工，使之具有個別特色，例如兵馬俑體系中的手和以粉本打底繪成的佛畫。⁶⁷相對於狹義的模件，廣義的模件擴及大致標準化的裝飾與繪畫母題。這類模件以手繪為主，由於不依賴模具，即便由同一畫工繪製，相同母題也會出現細微差異，因此靈活性大，可因應

頁 58。

64 葛承雍，〈環形壺：從地中海到大興城——西安隋墓出土環形壺（askos）藝術研究〉，頁 67。

65 Lothar Ledderose, *Ten Thousand Things: Module and Mass Production in Chinese Art*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1, 16。中譯見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張總等譯，《萬物：中國藝術中的模件化和規模化生產（*Ten Thousand Things: Module and Mass Production in Chinese Art*）》（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頁 4、22。

66 Ledderose, *Ten Thousand Things*, 6, 25–49, 156–158.

67 Ledderose, *Ten Thousand Things*, 6, 70–73, 168–176.

構圖放大縮小、增減細節。這類模件除了高度機械化的陶瓷裝飾，在重視個人風格的文人畫也見其蹤跡。⁶⁸顯然「模件化」不僅是一種製作方式，更是這種製作方式背後的设计思維，可以延伸至畫面構圖乃至立體作品的設計。

陶瓷產品模件化生產最典型的案例是俑類。謝明良早已運用墓葬與窯址出土品展現唐代陶工如何大量製備由各種尺寸翻模成形的零件，運用不同組合搭配，有效率地製作變化多端的產品。⁶⁹這樣的製作模式在北朝到隋的陶俑上也能見到。相較之下，器皿類對模具的倚賴性較低，但陶工同樣大量製備一系列不同尺寸的標準化模件，相互搭配，組合成多樣產品。

以下分析顯示從北朝末到唐，龍柄如何搭配不同模件組成不同器形。值得注意的是，許多看似和龍柄器皿無關的器形，其實與之共用模件。

（一）北朝到隋

從分布看來，在六世紀下半，北齊晉陽是龍柄器皿最主要的生產與使用中心。由於婁叡墓出土五件雞頭壺，且資料齊全，以下以此墓出土品為例。⁷⁰發掘報告依造型與貼花裝飾將雞頭壺分為兩式（圖 23、24），兩式器形大致相同，均為分部製作後接合。倒卵形身的腹部是上下兩半分別成形後拼接而成，接合處以凸稜裝飾。龍柄背後均有一道陰刻紋，乍看之下為兩股泥條組成，實際上是一條橫剖面為方形的泥條；龍的頭部為模具製成，頭頂均有一個小卷鬚，卷鬚後有一片如意雲狀泥片作為貼飾。這批器物均為帶黃綠色調的低溫鉛釉，可能為同一作坊生產。

兩式相異之處主要在龍柄和繫的造型，以及器身上的蓮瓣紋和貼花。藉由比對貼花，可以看出陶工如何採用數量有限的模製貼花在不同器物上展現多樣視覺效果。以 I 式雞頭壺的標本 705 為例（圖 23），貼飾部分除了雞首與龍柄，還有兩種繫，以及忍冬、鳥形、獸面等貼花。肩部兩側的正中央是以忍冬紋裝飾的三角形繫，其下緊連一束底端帶寶珠的長忍冬紋貼花，越過腹部的凸稜後，是一隻模製的正面立鳥。雞首和龍柄下方各以獸面貼花裝飾，越過腹部的凸稜後，也各有

68 Ledderose, *Ten Thousand Things*, 6, 90–97, 200–213.

69 謝明良，〈唐俑札記——想像製作情境〉，收入同氏著，《陶瓷手記 3：陶瓷史的地平與想像》（臺北：石頭出版社，2015），頁 221–234。

70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齊東安王婁叡墓》，頁 137。

一隻模製的正面立鳥貼花。其中，忍冬紋裝飾的三角形繫和帶寶珠的長忍冬紋貼花都能在 II 式雞頭壺上看到，但陶工改變了配置，搭配其他種類的模製貼花，為相似器形作出不同裝飾，成為視覺效果不同的產品。以標本 703 為例（圖 24），陶工同樣採用以裝飾忍冬紋的三角形繫緊連底端有寶珠的長忍冬紋貼花，但並非配置在器側中央，而是在更靠近龍柄和雞首的地方。中央則裝飾一個被高浮雕覆蓮紋環繞的三角形繫和一束簡約的忍冬紋。忍冬紋的下方貼飾正面立鳥，但立鳥的造型與 I 式的不同。

這些同模貼花也用在雞頭壺以外的器形。以 I 式雞頭壺的淺浮雕獸面紋貼花為例，此獸張著血盆大口，露出四根獠牙，眼瞼低垂，鬃毛向左右各分為四股向上卷曲。⁷¹ 同模的獸面紋也運用在長頸貼花寶裝壺（圖 25）和圓蓋貼花寶裝壺（圖 26）。但不同於在 I 式雞頭壺上的運用，陶工以一些小零件作出變化。在長頸貼花寶裝壺的腹部裝飾四個獸面，陶工以泥條貼出環形，將單純的獸面轉化為獸首銜環。在圓蓋貼花寶裝壺上，則以三個獸面紋裝飾在頸部，每個獸面正下裝飾一朵高浮雕蓮瓣紋。陶工將每個獸面紋的大口和其下的蓮紋以一條細泥條連接，作為蓮莖，製作出獸銜蓮花的效果。值得注意的是，同樣的高浮雕蓮瓣紋也運用在蓋上，中間填以寶珠形蓋鈕。如前所述，在 II 式雞頭壺上也能看到高浮雕蓮瓣紋，只是中間以三角形繫填充。可見高浮雕蓮瓣紋在不同器形的作用。

長頸貼花寶裝壺和圓蓋貼花寶裝壺除了使用相同貼花，在器形上也可能使用相同模件。兩者在肩頸交界處都有一道稜線，稜線下部的輪廓相似，均為鼓腹且足外敞，且兩者的腹徑分別為 28 和 26 公分，考量兩者為轆轤拉坯而成，可說兩者腹徑大致接近。陶工可能使用相同的部件，藉由搭配不同高度與造型的頸來生產不同器物。

以上所舉的案例均為器皿，但上述貼花的使用不限於器皿類。婁叡墓 I 式釉陶燈的柄靠下端燈座處（圖 27），有帶寶珠的長忍冬紋貼花，這在兩式雞頭壺上都有。另外，燈蓋上較簡約的忍冬紋也見於 II 式雞頭壺。

其他墓的出土品也見相同模件。婁叡墓 I 式雞頭壺上的淺浮雕獸面紋貼花也見於徐顯秀墓的釉陶壺（圖 28），I 式和 II 式燈座上的蓮瓣紋貼花也見於徐顯秀墓

71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齊東安王婁叡墓》，頁 138。

的燈座（圖 29）。考量徐顯秀墓的釉陶壺、燈、雞頭壺等器物也是帶黃綠色調的鉛釉陶，加上兩座墓的位置相近，很可能和婁叡墓的釉陶器出自同一生產中心，甚至同一作坊。龜井明德推測韓裔墓與婁叡墓的雞頭壺出自同一作坊，因為兩者均屬大型品，整體器形以及將器身上半以線刻成爲覆蓮紋的裝飾手法相似。⁷² 值得注意的是，兩墓的雞頭壺在雞首和龍柄上極其相似，顯示作爲模件龍柄可能搭配不同形狀的器身。上述案例展現出工匠藉不同器形部件和貼花做出各種成品的生產模式。

在隋代也有相同的情形，陝西西安李靜訓墓同時出土雞頭壺與雙身雙柄壺，兩者胎釉特徵相似，明顯出自同一作坊。由器物上的接痕可以看出，製作白瓷雞頭壺（圖 3）時，陶工將底部外撇的倒卵形身接上帶盤口的細頸，器肩左右兩側分別貼上雞首和柄。柄身由雙股泥條拼合，頂端是以左右合模製成的龍頭，雙眼、耳朵與下顎後方幾道羽狀裝飾物都是合模成形時印上，但頭頂的卷鬚是手塑後貼上。下顎以泥條表現，貼在盤口外側，做出銜著盤口的樣子。雙身壺（圖 4）的模件和雞頭壺的造型特徵幾乎一樣，只是尺寸以及搭配方式有別。首先，其帶盤口的細頸與倒卵形身尺寸較小，但是底部外撇的曲度相似，此外，雙身壺的龍柄特徵與雞頭壺的一模一樣。可以想見陶工製作多樣尺寸但造型類似的各式模件，之後組裝：挑選兩個小的倒卵形身、帶盤口的頸以及兩支龍柄製成雙身壺；挑選尺寸大的倒卵形身、帶盤口的頸，搭配上一支龍柄，在另一側安上雞首，再在側邊各貼上一個帶鈕的繫，便做出雞頭壺。這樣的製作思維有助於了解新器形的發明，這點將在討論設計意匠時論述。以下先看唐代的情形。

（二）唐代

在七世紀下半，則有更多不同器形採用相同模件的案例。唐代雙龍柄壺集中出土於兩京地區，尤其是作爲東都的洛陽一帶及其周圍的偃師和鞏義。在墓葬出土品就有雙龍柄壺與瓣口瓶上採用造型類似龍柄的案例。目前紀年最早的雙龍柄壺均出土於洛陽，兩件出自張文俱墓（圖 30、31），⁷³ 一件出自陳暉墓（圖 32）。⁷⁴

72 龜井明德，〈北朝—隋·初唐期罐·瓶の編年の研究〉，收入同氏著，《中国陶瓷史の研究》（東京：六一書房，2014），頁 71。

73 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唐代張文俱墓發掘報告〉，頁 12-13。

74 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陽關林唐代陳暉墓發掘簡報〉，頁 6-7。

張文俱墓出土編號 HM1940:2 的壺柄為典型帶大卷鬚的龍。鞏義城西變電站出土的瓣口瓶（圖 2）主體和雙龍柄壺不同，但帶有造型相似的龍柄。⁷⁵顯然，龍柄搭配不同模件形成雙龍柄壺和瓣口瓶。

類似造型的龍柄殘件就出現在鄰近的鞏義窯，這是唐代最具規模的窯場之一，模件化生產相當成熟。鞏義白河窯的兩件破片均為銜著壺口的龍（圖 33）。⁷⁶兩者造型僅有些微差異，一件眼部後方面積較大，以三道陰刻紋裝飾，一件沒有。黃冶窯也發現不少龍柄殘件但保存狀況不佳，僅有一件微微泛青的白瓷產品保存相對良好（圖 34）。⁷⁷這幾件破片的龍頭上均帶大卷鬚，且身體以雙股泥條製作，是雙龍柄壺與瓣口瓶上最常見的龍柄樣式。從出土品看來，工匠可能製作多種樣式的龍柄來代換，例如張文俱墓出土的另一件雙龍柄壺（編號 HM1940:1）（圖 24）與陳暉墓的（圖 25）都以泥粒裝飾龍頭；鞏義芝田唐墓（93HGSM1）的出土品則是在臉頰兩側各貼一片泥片其上刻劃出鬚毛，頭頂不是大卷鬚，而是上翹的尖角。⁷⁸更有以其他神獸為裝飾的物件，例如洛陽洛龍區唐墓（C7M6915）的出土品偏獅形，洛陽唐垂拱三年（687）恭陵哀皇后墓的像鳳鳥。⁷⁹顯然雙柄壺的各種把柄具模件性質。

除了龍柄，雙龍柄壺還具其他模件。仔細觀察能發現，大部分物件在細頸與倒卵形身之間有接合痕跡，顯示帶盤口的細頸與倒卵形身為分別製作後接上。製作時可能事先塑好器身，修整上端以因應不同的頸部。張文俱墓的多件出土品極有可能就以這種方式製成。除了兩件雙龍柄壺（圖 30、31），還出土多件平口圓唇折沿瓷罐（圖 35）和斂口瓷罐（圖 36）。三類器皿釉色呈現青與青白色，露胎處特徵相似，可能出自同一窯口；此外，三者均以倒卵形器身為主體，展現出在作坊中的關聯。兩件雙龍柄壺的倒卵形身和頸部之間有接合的痕跡，顯示器

75 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鄭州博物館，〈鞏義城西變電站唐墓發掘簡報〉，頁 31、33。

76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日本奈良文化財研究所編著，《鞏義白河窯考古新發現》（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頁 132。

77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日本奈良文化財研究所編著，《鞏義黃冶窯》（北京：科學出版社，2016），頁 73-74、彩版 30。

78 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鞏義芝田晉唐墓葬》（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頁 194-196，彩版 21 之 1。

79 謝明良，〈唐咸亨年（670-674）的陶瓷景觀〉，頁 13。圖版參見洛陽市考古研究院，〈河南洛陽洛龍區唐墓 C7M6915 發掘簡報〉，頁 36-37，封 3 之 1；朝日新聞社、大塚編，《唐三彩展：洛陽の夢》（大阪：大塚，2004），頁 51，圖 21。

身和帶盤口的長頸是分開製作。再比對平口圓唇折沿瓷罐和斂口瓷罐，兩者都和雙龍柄壺一樣有倒卵形身，且三者器肩弧度非常相似，唯一的差別是頸部。陶工可能製作大量帶平口圓唇短頸的罐，若直接燒造會成為平口圓唇折沿瓷罐。若是截去短頸，或者拉坯時不拉出頸部直接修整，會成為斂口瓷罐。若是在截口處裝上帶盤口的長頸，會成為雙龍柄壺的主體。雖然張文俱墓不見龍柄斂口瓶，但不難想像，如果陶工改以梨形身和喇叭形高足配龍柄，可以得到鞏義出土的斂口瓶（圖2）。

博物館藏品提供另一組案例。先由龍柄出發，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雙龍柄壺（圖37）和日本天理大學附屬天理參考館藏斂口瓶（圖38）的龍柄幾乎一模一樣。頭部均以管狀物戳印出眼睛，上方貼塑了尖尖的長耳朵，而後是卷鬚；卷鬚中間夾了一片如意形薄陶片，其後緊貼一片一樣的陶片。身體均為兩股泥條相併，以刻痕裝飾。值得注意的是，兩件器物龍身刻痕的下刀位置和斜度幾乎一樣（圖37b、38b）。此外，兩者均以褐、綠、白釉點裝飾，雙龍柄壺肩部與斂口瓶頸部三種釉色呈現出的斑點分布樣態相似，顯示兩者極有可能出自同一作坊。⁸⁰由於龍身不是以模具製作而是手工，龍耳與如意雲等細節為捏塑，刻痕也是徒手刻劃，要能達到這麼高的相似程度，這兩件龍柄甚至可能由同一名工匠製作。然而，這兩件龍柄接在截然不同的主體上，形成不同的器類。

龍柄也能和其他造型的柄代換。美國克里夫蘭藝術博物館（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藏的斂口瓶（圖39）和天理參考館藏品在造型、上釉手法和配色等方面幾乎一樣，可能也出自同作坊。值得注意的是，兩者的把柄也同為兩股泥條相併而成，後面貼有乳丁，但天理參考館藏品的把手上端預留較多的泥，以便添加細節做成龍頭，克里夫蘭藝術博物館的僅在頂端加飾一個簡單的環。這組案例再次顯示，龍柄僅為作坊中的把柄模件之一。

回到東京國立博物館藏雙龍柄壺，但以收藏於美國芝加哥藝術博物館（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的三彩貼花罐為比較對象（圖40）。兩者倒卵形身的弧度幾乎一樣，器上均有陰刻弦紋，除了裝飾，也是貼附零件的定位線。⁸¹雙龍柄壺的

80 黃冶窯白釉技法見巽淳一郎，魏女譯，〈鉛釉陶器的多彩裝飾及其變遷〉，收入北京藝術博物館編，《中國鞏義窯》（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11），頁342-345。

81 承蒙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謝明良教授教示，謹致謝忱。

龍柄下緣緊貼器肩上的弦紋，貼花上緣則緊貼在同一條弦紋下方。三彩罐的短頸下緣有一圈淺陰刻弦紋，這個位置也是東京國立博物館藏雙龍柄壺的長頸接在器身上的位置。另外，兩者的貼花幾乎一樣：中間一朵大的寶相花，寶相花由多重自中心向外輻射的六出花瓣組成，外圍兩重花瓣為羽狀，中間用魚子地裝飾。每兩瓣之間又再伸出一支以側面呈現的花莖。花底為放射狀細線，貼花外緣由細聯珠紋環繞。兩者器身上的釉彩相似，胎質均潔白細膩。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也藏有一件帶同樣貼花的三彩罐，器形與釉色也相似。⁸² 類似作品還見於 1976 年小學館出版的《世界陶磁全集》（圖 41）以及洛陽金家溝出土品（圖 42）。上述器物在部件、貼花、器形以及釉色上的相似顯示出它們可能出自同一作坊。

這些作品的產地指向河南鞏義一帶。洛陽金家溝的出土品顯示上述幾件博物館藏品可能也出土自洛陽與周邊地區，此地鄰近鞏義窯。⁸³ 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藏品在器形上與金家溝出土品類似，館方推斷為鞏義窯產品。⁸⁴ 基於鞏義黃冶窯出土不少帶有大而繁複的寶相花紋的器物與模具，與東京國立博物館藏雙龍柄壺的寶相花紋有相同意匠，龜井明德認為該件雙龍柄壺為鞏義黃冶窯產品。⁸⁵

藉由觀察作品可以推想當時陶工的製作模式。陶工製備帶短頸的倒卵形器身、球形器身、喇叭形足、帶盤口的長頸、帶花口的長頸、寶相花貼花飾片、龍柄，之後一一組裝。直接以貼花裝飾帶短頸的倒卵形器身，便會得到如芝加哥藝術博物館藏的罐（圖 40）。若將罐的短頸切除，改裝帶盤口的長頸並加上兩支龍柄，就能得到東京國立博物館的雙龍柄壺（圖 37）。若選擇球形器身，接上喇叭形足和帶花口的長頸，就能得到天理參考館的瓣口瓶（圖 38）。若不選擇龍柄，改用僅有簡單環形裝飾的柄，便能做出克里夫蘭藝術博物館的瓣口瓶（圖 39）。

陶工也藉由增減貼花數量、搭配不同貼花與釉色創造出不同產品。東京國立博物館藏雙龍柄壺（圖 37）與芝加哥藝術博物館（圖 40）和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的三彩貼花罐都只用寶相花圓盤貼花裝飾，⁸⁶ 洛陽金家溝出土品（圖 43）則

82 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登錄番號：00161。圖版見〈三彩貼花寶相華文壺〉，《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收藏品檢索》https://jmapps.ne.jp/mocoor/det.html?data_id=9（檢索日期：2025 年 6 月 23 日）；圖版攝影：六田知弘。

83 洛陽博物館編，《洛陽唐三彩》（鄭州：河南美術出版社，1985），圖版 71。

84 圖版說明見〈三彩貼花寶相華文壺〉，《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收藏品檢索》。

85 龜井明德，〈隋唐期竜耳瓶の形式と年代〉，頁 137-138。

86 圖版見〈三彩貼花寶相華文壺〉，《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收藏品檢索》。

在器頸下方貼上葉形裝飾，補充寶相花圓盤貼花間的空隙。1976年小學館出版的《世界陶磁全集》刊載的三彩貼花罐（圖41）也在器頸上貼上葉形裝飾，但以綠釉為主，呈現不同的視覺效果。⁸⁷

上述生產情境受到窯址出土品支持。鞏義黃冶窯2003年的發掘成果呈現不少案例，以常見的樽和三足爐為例。⁸⁸ II區四號探方十五號灰坑出土不少樽，均有模製馬蹄形足，但搭配不同器身。有些器身平滑（圖43），有些滿佈弦紋（圖44）；陶工還製作多種同造型不同尺寸的器物。⁸⁹ III區九號探方則出土不少以獸足搭配不同器身的三足爐，有些為扁圓形器身（圖45），有些器身接近球形（圖46）。有些在弧形肩下方接上直腹，之後緩緩內收為圓底，而平直的中段又能以不同手法裝飾，有些平滑（圖47），有些滿佈弦紋（圖48）。⁹⁰ 另外也有器形變化的案例，II區五號探方同時出土三足爐和鉢。工匠若取基本型上釉，可成為鉢，也可以保留頸口，加上模製的足，成為三足爐。⁹¹ III區五號探方出土了不論口徑、底徑、高度都大同小異的杯與帶把杯。⁹² 兩種杯不論口徑、底徑、高度都大同小異，陶工製作基本形後，可以直接素燒上釉成為杯，或者可以接上把手，成為帶把杯。上述幾種產品又能變化尺寸，並搭配不同貼花、釉彩、施釉手法，成為多樣成品。由於以上各組案例的幾種成品都出土在相當小的範圍，極有可能是來自同作坊的產物，充分展現作坊的模件化生產過程。

除了器形模件，黃冶窯出土大量製作貼花的模具以及帶紋飾的破片，這些破片透露出陶工如何以有限的模具製作不同紋飾，裝飾在不同器形。其中以寶相花為大宗。由於寶相花種類多樣，以下從與雙龍柄壺生產時代和地區重合的案例切入。2019年發現的河南洛陽洛龍區潘寨村唐墓M2371出土一件龍首為典型帶大卷

87 相賀徹夫編，《世界陶磁全集·11·隋·唐》（東京：小學館，1976），頁49。

88 發掘報告將有筒形身與三足的器形定為「樽」，本文從之。其他器形亦依從發掘報告。見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日本奈良文化財研究所編著，《鞏義黃冶窯》，頁125。

89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日本奈良文化財研究所編著，《鞏義黃冶窯》，頁125。

90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日本奈良文化財研究所編著，《鞏義黃冶窯》，頁162-165。

91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日本奈良文化財研究所編著，《鞏義黃冶窯》，頁75、83，彩版31之3-4、39之2。

92 杯（標本 IIIIT5H25:30）、帶把杯（標本 IIIIT5H25:37）見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日本奈良文化財研究所編著，《鞏義黃冶窯》，頁150-151，彩版110之2-3。

鬚的雙龍柄壺與一件三彩洗（圖 49），其上的寶相花在鞏義黃冶窯大量出土，素燒和三彩標本均有，是用像印章一類的模具壓印而成。⁹³ 目前公布的標本以洗（圖 50）為大宗，但在日本永青文庫的一件三彩三足盤（圖 51）上也能看到相同的寶相花，說明此紋飾不限用於特定器形。此外，在洗上，寶相花多單獨出現，在永青文庫藏的三彩盤則配合盤面尺寸，搭配其他紋飾模件如雲氣紋，產生不同畫面。

雖然鞏義黃冶窯的遺物多出土於作坊遺址以外的位置，但陝西銅川市的黃堡窯址出土一座保存完好的三彩作坊（編號 Z2）補足這項遺憾。這座作坊可能因為突如其來的洪水而廢棄，內部留有大量未完成品與生產工具，有助於一窺帶柄器物的製作流程。

黃堡窯三彩作坊為七個黃土高原常見的窯洞組成，由東向西編號為一到七，第二窯洞東北有座三彩窯緊鄰，是作坊的一部份。考古學者由各窯洞布局和出土遺物推測這是一座高度分工的專業生產遺址，作坊內可能有十八人同時參與工作。⁹⁴ 其中，第六窯洞為製作執壺的場所，窯洞中部有轉盤軸坑，後半密布未安流嘴的執壺坯，旁邊一個桶狀匣鉢則裝滿尺寸相符的流嘴坯，同時也發現製作流嘴用的模。⁹⁵ 考古學者推測至少有兩人同時在此窯洞內參與製作，雖然不得而知當時是否如現代工廠般進行流水線分工，但由作坊遺物可以看出陶工透過拉坯和模製大量製作壺身、流嘴、提把，分別成型後組裝。⁹⁶ 第四窯洞為合模場所，出土大量模具，包括多樣壺柄模。⁹⁷ 顯示陶工能透過搭配不同器把製作出多樣器物。而第六窯洞的執壺坯則透露，即便不倚賴模具，陶工依舊實踐大量製備一系列標準化模件後組裝的生產程序。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鞏義窯與黃堡窯的釉料鉛同位素分析結果顯示兩窯的鉛料來源不同，且支釘形制不同，為兩個獨立的唐三彩生產中心。⁹⁸ 然而，兩者出土

93 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洛陽洛龍區潘寨村唐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22 年 4 期，頁 47-48；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日本奈良文化財研究所編著，《鞏義黃冶窯》，頁 104-106、119-120、156-157、172-174。

94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唐代黃堡窯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頁 24。

95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唐代黃堡窯址》，頁 17、477-478。

96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唐代黃堡窯址》，頁 24。

97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唐代黃堡窯址》，頁 15、477-479。

98 研究者指出「此分析之樣本由上百件殘片中隨機挑選，希望結果可以具有代表性」，詳見崔劍峰、雷勇、黃寶玲，〈河南鞏義窯和陝西黃堡窯出土唐三彩殘片釉料的鉛同位素產源研究〉，收

品中有相當多同類器物，例如燈、執壺、盒、埴、雙魚壺，且這些同類器物的造型相似。相較於鞏義黃冶窯，黃堡窯出土器物的結構相對簡單。因此，如果連黃堡窯作坊都採具規模的模件化生產，可以推想黃冶窯的模件化生產情境更加繁複。

上述案例展現陶工如何用龍柄等模件相互搭配，製作不同器類。下一步需要問的問題是，個別模件的設計從何而來？模件組合方式，也就是器形與紋飾設計，受什麼因素驅動與限制？模件化生產對於器形與紋飾的設計又有什麼影響？

四、設計意匠中的模件集合

從上一節雙龍柄壺、三足爐及帶把杯的案例來看，三者有各自的關聯器物。以雙龍柄壺為核心，可看到其與瓣口瓶、具倒卵形身的斂口罐與短頸罐等共用模件。然而，三足爐和這些器形屬於不同模件庫，三足爐常見的獸足鮮少和任何倒卵形身或者帶長頸的器物組合。同樣，帶把杯的環形把未見於長頸壺瓶類。可以說，即便在同一個作坊，雙龍柄壺、三足爐及帶把杯與各自相關器皿分屬不同模件庫。工匠對器形的設計，決定了模件的造型、種類及組合方式。相對地，模件化生產這樣由來已久的思維，也使工匠在設計器形時會將各部件設計得較容易代換。正如模件化生產模式貫穿製作程序與設計意匠，模件庫也貫穿了兩者。在設計時，模件庫不僅是作坊貼花與器形上預製的標準化零件集合，也可以抽象化至想法層次，將其視為一群裝飾母題和器形特徵的集合。這些構成某一群相關器物所需模件形成的集合可視為模件庫。模件庫僅占作坊所擁有器形和紋飾的一部份，或者可以說多個模件庫的集合形成作坊擁有的素材庫或資料庫，工匠能從中取材，形成能夠相互代換組合的模件。不論素材或模件都可能繼承自前代或者吸取外來因素，而吸取過程中往往歷經轉換、微調，甚至解構與重構。由於學者在紋飾方面的研究多於器形，因此先由紋飾談起。

作為龍柄器皿上標誌特徵的「龍」被視為中土動物紋飾的代表，可以上溯至商周青銅器，到漢代依舊是重要紋飾，此外，依不同需求以及材質特性以立體、淺浮雕以及平面手法展現。⁹⁹ 然而，北朝到唐龍的形象和前代稍有不同。自北魏

入北京藝術博物館編，《中國鞏義窯》（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11），頁 367-371。

99 Rawson, *Chinese Ornament*, 93-98.

始，龍的背上經常以帶火焰的寶珠裝飾。¹⁰⁰ 這樣的特徵在北齊的墓葬圖像也能看到：位於首都鄴城的河北邯鄲磁縣灣漳大墓墓道東壁壁畫的青龍背上便有。¹⁰¹ 晉陽的婁叡墓的墓門彩繪一對青龍白虎，龍背上就有寶珠（圖 52）。¹⁰² 到隋唐，背上有寶珠的龍仍不時可見，在碑首和墓誌都能見到。¹⁰³ 摩尼寶珠是隨著佛教傳入的新圖像，但將其與龍結合，是本土工匠的創新。

這項特徵被運用到龍柄器皿上。六世紀下半的北齊便有實例。婁叡與徐顯秀墓雞頭壺上龍角的前端刻劃出橫紋，婁叡的末端微微翹起（圖 23、24），這些特徵和婁叡墓墓門彩繪的龍相似。此外，兩墓雞頭壺的龍柄頸上均有如意雲形泥片。由造型與黏貼位置來看，極可能是要表現龍身上的摩尼寶珠。其中，徐顯秀墓雞頭壺的如意雲紋泥片外圍刻劃放射性短線，表現摩尼寶珠的火焰紋。到了隋唐，龍的大卷鬚後方上貼如意雲形泥片是雙龍柄壺與瓣口瓶上最常見的龍柄造型。雖然漢代也有神獸形柄容器且被辨識為「龍」，北朝未到唐代龍柄器皿的龍頭造型顯然是北魏以降，結合佛教摩尼寶珠紋樣後的新傳統。

或許因為龍在墓葬與石窟經常和其他神獸一同出現，設計器形時也受置換。以雙柄壺為例，河南洛陽洛龍區唐墓（C7M6915）的為獅形柄，洛陽恭陵袁皇后墓的帶鳳鳥柄。¹⁰⁴ 此外，在設計與實際製作上都能再拆解。¹⁰⁵ 如前所述，天理參考館和克里夫蘭藝術博物館的瓣口瓶（圖 38、39），從口沿到足都相同，只有柄不同，而兩者的柄在實際製作時是一體成形的附件。然而，在設計上可拆解。克里夫蘭藝術博物館藏品，僅保留作為「龍身」的雙股泥條加上乳丁，但頂部改用簡單的環。英國大英博物館（The British Museum）藏有一件更簡化的作品。其器形

100 謝明良，〈龍與龍珠〉，原載《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52 期（2022.3），收入同氏著，《陶瓷手記 5：中國陶瓷的器形、紋飾與圖像》（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23），頁 91-95。

101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磁縣灣漳北朝壁畫墓》（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頁 147，圖 110。

102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齊東安王婁叡墓》，頁 78，彩版 76-77。

103 謝明良，〈龍與龍珠〉，頁 86-91、101-108。

104 謝明良，〈唐咸亨年（670-674）的陶瓷景觀〉，頁 13。圖版參見洛陽市考古研究院，〈河南洛陽洛龍區唐墓 C7M6915 發掘簡報〉，頁 36-37、封 3 之 1；朝日新聞社、大塚編，《唐三彩展：洛陽の夢》，頁 51，圖 21。

105 在雷德侯提出的系統中「模件」只是其中一個層級，由簡到繁分別為「元素（element）」、「模件（module）」、「單元（unit）」、「序列（series）」、「總集（mass）」。

見 Ledderose, *Ten Thousand Things*, 10；雷德侯，《萬物》，頁 14。

與胎釉特徵和前兩件相似，可能也來自鞏義窯，且製作時間相去不遠。¹⁰⁶ 其柄連乳丁都省略，但在頂部與底部各裝飾一顆泥球，把柄接合器口的地方則有模印的葉形紋飾。在頂端裝飾一顆圓球是西來胡瓶上常見的把柄形式，甘肅武威慕容智墓出土的胡瓶也具這項特徵，把手前端以葉形表現也能在俄羅斯艾米塔吉博物館（The State Hermitage Museum）藏品上看到，但把手均是單股。¹⁰⁷ 不排除唐代陶工實際看過帶類似裝飾的金屬胡瓶，但以經常作為龍身的雙股泥條表現把手。

在紋飾中，唐代的寶相花是透過解構和重構產生創新的經典案例。河南鞏義黃冶窯的出土品有大量製作貼花的模具以及帶紋飾的破片。其中，大部分是廣義的寶相花，以及在寶相花外層花瓣構成的環中填裝其他紋樣形成的團窠。以下從這類紋飾切入，揭示陶工的設計思維。

回到鞏義窯標本與河南洛陽洛龍區潘寨村唐墓 M2371 三彩洗上的寶相花（圖 49）。¹⁰⁸ 此朵寶相花外圈由類五角形的花瓣環繞而成，每瓣花瓣由四重陰刻線組成。花心的部分是雙圈，圓心有一朵花，外面綴有圓圈，對應在中心花朵兩瓣花瓣的中間。在製作時雙圈可能刻在同一個印章式模具上，以減省對準位置所需的時間與心力。但在設計上，可以進一步解構。一件素燒洗（標本 IT1 ⑨：176）的中心不是花，而是舉起雙翅的鴨（圖 53），另外幾件則有不同朝向的鳳鳥（圖 54）。¹⁰⁹ 展現陶工如何置換中心紋飾以創造新紋飾。

上述例子是代換中心紋飾，有案例顯示，陶工也能變化花瓣數目。以三彩洗為例，一件（標本 IT1 ⑨：69）（圖 55）口徑 24.6 公分，底徑 19 公分，高 7.2 公分；另一件（標本 IIIT9H79：35）（圖 50）口徑 24.3 公分，底徑 19.8 公分，高 6.3 公分。¹¹⁰ 兩件洗的尺寸非常相似，前者底徑甚至略小，但有十瓣花瓣，多於後者的八瓣。工匠往往會因為器皿尺寸調整紋飾，但這個例子顯示，有時未必是配

106 大英博物館（The British Museum）典藏號：1936,1012.209。圖版見“Ewer,” The British Museum, accessed June 22, 2025, https://www.britishmuseum.org/collection/object/A_1936-1012-209?selectedImageId=339589001

107 羅豐、曹中俊，〈甘肅武威慕容智墓中的胡瓶與葡萄酒〉，《文物》，2024 年 7 期，頁 57-60。

108 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洛陽洛龍區潘寨村唐墓發掘簡報〉，頁 47-48。

109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日本奈良文化財研究所編著，《鞏義黃冶窯》，頁 119-120、彩版 79-80。

110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日本奈良文化財研究所編著，《鞏義黃冶窯》，頁 104-105。

合容器尺寸，而是爲了展現不同視覺效果，做出疏朗與繁密的紋飾。

在模印陰刻搭配釉彩以外，陶工也直接以釉彩繪製類五角形的複層花瓣（標本 IIIIT9H79：3）（圖 56）。相較於模印，彩繪手法有更大的調整空間，且能搭配鉛釉自由流淌的特性形成暈染。藉由調整模件的數量、尺寸、種類，再搭配不同技法，陶工能以有限的模件展現多樣視覺效果。

其他類型的寶相花也展現解構與重構。例如 1975 年出土於洛陽北窯段子溝的三彩盤（圖 57），中心是隻向右展翅飛翔的雁鳥，雁鳥由三縷雲氣環繞，三縷雲氣外是由八枝微向右彎的側面花朵（也可看作八簇向右飄的五出雲氣紋）組成的環，環外圈有八枝以側面呈現的花朵，呈現傘狀。同樣造型的雁鳥也見於 1972 年洛陽關林變電站出土的三彩盤（圖 58），只是周圍不是花環，是六簇雲氣，而此盤上的雲氣紋和北窯段子溝花環內圈花朵（雲氣）相似，只是北窯段子溝的雲氣尾端朝向雁鳥並相連成環，關林變電站的雲氣紋尾端朝外且各自獨立。北窯段子溝的盤直徑爲 28 公分，關林變電站的僅有 17 公分。這組案例展現陶工如何以相同的雁鴨搭配不同紋飾，配合盤面尺寸形成多樣構圖。

目前不能完全排除陶工在製作時將雁鴨、兩種雲氣、花環分別刻在不同模具上後應盤面尺寸挑選並依序印上盤坯的可能性，然而，更高的可能性是製作一個模具，上有由三種花紋組成的團窠，一次模印成形。¹¹¹ 這樣的可能性受實物支持。東京國立博物館藏的一件飛鳥紋三彩三足盤（圖 59）就與北窯段子溝的出土品極度相似，就連大雁、雲氣、花環之間的空隙以及三者的相對位置都幾乎一樣，應是以一個刻有團窠的模具模印成形。此外，其配色與上色技法也相同，只是北窯段子溝的三彩盤大雁背後的雲氣受綠釉沾染較少，東京國立博物館較多。從這組例子可以推想，陶工由模件庫中取得雁鳥紋、兩種雲氣紋以及傘狀花卉，組合出不同種團窠並製作成不同模具，之後搭配不同釉彩，形成不同裝飾。

花環的進一步解構也展現上述設計思維。與東京國立博物館藏飛鳥紋三彩三足盤（圖 59）相似的傘狀花朵也能在同館收藏的三彩三足盤（圖 60）上看到。同樣裝飾在花環的最外圈，但這次搭配上分爲三層的傘狀花朵，彼此相間。內圈則

111 雖然目前無法排除模具爲活動式，可以和上面刻有其他紋飾的印章是模具一同嵌入不同底座，形成不同模具，但目前鞏義窯出土的模具以單一紋飾爲主，或者成印章式模具或爲貼花模。

是初綻的花朵與蓓蕾相間，這些外圈四種側面花朵莖部相連，組成一個環狀。環內則以一圈花瓣以及一朵幾何性強的八瓣花為中心。兩件三彩盤的傘狀花在鋸齒的弧度以及內外兩道弧狀鋸齒線條的間距上有些微不同，但仍能看出陶工如何以同類傘狀花搭配不同圖案設計出不同紋飾。

除了上述兩種，另一種常見的寶相花甚至跨越材質。這種紋飾在出土於陝西臨潼慶山寺地宮的三彩三足盤上能看到（圖 61）。¹¹² 其外圈由六瓣心形拼接而成，花瓣兩兩之間有環狀物束著，且有三出花邊像座橋搭在相鄰花瓣上；內圈則由一個小圓點外面環繞六個圓點加上六片緊密連結花瓣形成中心。這類寶相花在黃冶窯的素燒與三彩標本以及傳世品上經常見到，主要裝飾器類為盤和洗。¹¹³ 如同前兩種寶相花，工匠也調整瓣數或置換中心圖案來製作不同器物。此外，也搭配其他不同紋飾裝飾尺寸不同的器面，例如大英博物館藏三彩三足盤直徑僅有 18.8 公分，只以寶相花為裝飾；¹¹⁴ 慶山寺地宮三彩盤直徑有 24 公分，而陶工以釉彩變化填補周圍空白；《世界陶磁全集》刊載的一件寶相花紋三足盤（圖 62）直徑為 29.2 公分，除了中央的寶相花，還加上一圈雲氣紋豐富構圖。¹¹⁵ 工匠也藉著改動細部製作不同紋飾，例如大都會博物館藏三彩盤（圖 63），雖然結構相同，且外圍仍是外圈由六瓣心形拼接而成，花瓣間兩兩相束且也有三出花邊搭在相鄰花瓣上，但花瓣中的紋飾與盤中心的花卉不同。值得注意的是，寶相花外圍的雲氣紋和永青文庫的三彩盤（圖 51）極為相似，而永青文庫三彩盤中央的寶相花又與前述黃冶窯標本 IIIIT9H79：35 的一樣。這些例子再次展現陶工如何自模件庫取材創造不同紋飾，因應不同尺寸的盤面。

這類心形花瓣拼接而成的花環在其他材質的器皿也能見到，以下以陝西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的金銀器為例。鎏金鴛鴦紋銀盒（圖 64）的蓋心是隻高舉雙翅的鴛鴦，外圈是八瓣花瓣連成的花環；底面則是一朵寶相花，外圈飾以相同的花

112 共出土三件三彩三足盤。趙康民，〈臨潼唐慶山寺舍利塔基精室清理記〉，《文博》，1985 年 5 期，頁 30。

113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日本奈良文化財研究所編著，《鞏義黃冶窯》，頁 119-120、156-158、彩版 80。

114 大英博物館（The British Museum）典藏號：1947,0712.27。圖版見“Dish,” The British Museum, accessed June 22, 2025, https://www.britishmuseum.org/collection/object/A_1947-0712-27?selectedImageId=1613335417

115 相賀徹夫編，《世界陶磁全集·11·隋·唐》，頁 79。

環。¹¹⁶ 雖然搭在相鄰花瓣的部分是單純的弧形，花瓣間相束的部分也相對不明顯，但紋飾結構與花瓣特徵極度相似。同樣的花環在同出於何家村窖藏的鑲金翼鹿鳳鳥紋銀盒也能看到（圖 65），但環內置換為帶展翅鳳鳥的團窠，搭在心形花瓣間的弧形飾也增加，像是另一層花瓣。¹¹⁷ 依循這種視覺效果向外增添花瓣形成的寶相花紋飾，則出現在鴛鴦蓮瓣紋金碗（圖 66）。¹¹⁸ 在中層花瓣上，做為元素的三出飾帶搭在相鄰的花瓣上，形成外層花瓣的花心。相同的紋飾在鑲金花鳥紋銀碗（圖 67）和鑲金蔓草鴛鴦紋銀羽觴（圖 68）上也能看到。¹¹⁹ 兩者不論是器皿中心的寶相花還是周圍的蔓草與雲氣紋都相似，應出自同一作坊。但為符合器形差異，工匠將羽觴內寶相花最外層的六瓣減為兩瓣，因應橢圓器形。值得注意的是，這兩件銀器的雲氣紋和前述大都會博物館（圖 63）與永青文庫藏（圖 51）三彩盤的雲氣紋極為相似。從花環與雲氣紋的相似性程度看來，當時陶工和金銀匠集團掌握相同的紋飾，除了可能來自陶瓷這樣價格相對低廉的材質對金銀器的模仿，也可能因為兩種產業的工匠之間有共通的紋飾粉本或參考用的圖譜。¹²⁰

這種寶相花是唐代的創造，中野徹洞察這種創造是奠基在先前流行的紋飾上：相鄰的寶相花花瓣由相束的半棕葉組成，搭在兩花瓣間的三出弧線也用在雲氣紋的雲頭。¹²¹ Rawson 對寶相花和半棕葉有相同的觀察，並由文化交流的角度對這類寶相花的成立提出系統性說明。外環花圈的基本結構乍看之下是心形花瓣，仔細分析會發現這些花瓣是由一對對自中脊分開的棕葉組成。每對棕葉中段相束，向左右兩側延伸，和相鄰的半數棕葉相連形成觀者所看到的心形花瓣。搭在心形花瓣間的弧形飾帶其實是各束棕葉托著的花冠。¹²² 這些棕葉飾與其他渦卷葉飾隨著佛教的傳入，由西方傳入中土，首先裝飾在建築以及宗教造像和用器，之後廣泛

116 齊東方、申秦雁主編，《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遺寶精粹》（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頁 194。

117 齊東方、申秦雁主編，《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遺寶精粹》，頁 130-133。

118 齊東方、申秦雁主編，《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遺寶精粹》，頁 109-114。

119 齊東方、申秦雁主編，《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遺寶精粹》，頁 251-260。

120 Jessica Rawson, *The Ornament on Chinese Silver of the Tang Dynasty (AD 618-906)* (London: The British Museum, 1982), 1.

121 中野徹，〈隋唐陶磁の紋様〉，收入相賀徹夫編，《世界陶磁全集·11·隋·唐》（東京：小學館，1976），頁 292。中譯見中野徹，孔六慶譯，〈隋唐陶瓷的紋樣〉，《陶瓷研究》，1989 年 6 期，頁 51-52。

122 Rawson, *Chinese Ornament*, 68-69.

運用於世俗金屬和陶瓷器皿。¹²³ 北齊婁叡墓的貼花中便有棕葉飾，鞏義窯的寶相花則進一步顯示，棕葉飾與各式卷草等裝飾母題進到中土的模件庫後，除了以原有造型在模件庫中受運用，還經由解構、重構，再創為寶相花。

寶相花不僅跨媒材，同時也跨地域。在陶瓷器與金銀器之外，廣泛運用於其他媒材，尤其以棕葉紋重構成的造型，深受歡迎。Rawson 指出，敦煌洞窟藻井和韓半島出土新羅瓦當上也有類似紋飾。¹²⁴ 除了棕葉紋，聯珠紋內填其他紋飾的各種團窠圖樣也源源不絕地透過各種媒介自西而來，不斷受到模仿改造甚至解構重構。這些圖樣廣泛使用於陶瓷、金銀器、織品，乃至佛教石窟與墓葬。在織品上，重構自棕葉紋與卷草紋的花環甚至取代聯珠成為團窠圖樣的外框。¹²⁵ 剛才鞏義窯的案例也顯示寶相花能被拆解，填入禽類成為團窠，運用在陶瓷上。可以說，在同一時代，紋飾上有個跨材質共享的資料庫，工匠能從中取材，得到能運用在設計上的模件庫，藉由搭配模件庫中的模件設計出不同紋飾。¹²⁶

紋飾展現出的解構重構設計思維以及跨材質現象，有助於重新理解北朝到唐一系列龍柄器皿的設計。以下將器物的輪廓抽象化，將各部件視為圖案，推論工匠的設計思維。以出現年代最早的雞頭壺為例，其器形拆解後會得到一個設計模件集合，選取不同組合能設計出雙身雙龍柄壺、雙龍柄壺等，甚至其他目前難以排入龍柄壺演變序列或者找到確切來源的器形。選擇卵形身、盤口、長頸、三個繫，能設計出梅淵墓的三繫龍柄壺；選擇三支龍柄，能設計出英國牛津阿什莫林博物館（Ashmolean Museum）所藏的三龍柄壺。¹²⁷ 其他各樣有繫和沒繫的龍柄盤口壺和雙身雙龍柄壺也是這樣設計出的。¹²⁸

123 Rawson, *Chinese Ornament*, 65.

124 Rawson, *Chinese Ornament*, 68–72.

125 趙豐，〈隋唐絲綢上的團窠圖案〉，《故宮文物月刊》，160期（1996.7），頁20；尚剛，〈吸收與改造——6至8世紀的中國聯珠圖紋織物〉，收入趙豐、齊東方編，《錦上胡風——絲綢之路紡織品上的西方影響（4-8世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頁20-21。

126 施靜菲以元青花的裝飾提出宋元跨材質的「圖案資料庫」。施靜菲，〈景德鎮元青花瓷之裝飾分析：宋元時期的「圖案資料庫」〉，收入上海博物館編，《幽藍神采——2012上海元青花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2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頁253-266。

127 阿什莫林博物館（Ashmolean Museum）典藏號：EA1956.1072。圖版參見“White Ware Amphora with Handles in the Form of Dragons,” Ashmolean Museum, accessed June 22, 2025, <https://collections.ashmolean.org/object/358446>

128 有繫的雙身雙龍柄壺見千年邢窯編輯委員會編著（趙慶鋼、張志忠主編），《千年邢窯》，頁58。

若在模件庫中加入其他模件，可以設計出更多種龍柄器皿。例如新增「蹲猴」，則可產生如山東泰安採集而得的蹲猴龍柄壺；新增環形器身，可產生龍柄環形壺。新增象首形的流嘴、蘋果形身、短頸、以帶細流的蓋封住盤口，可形成張盛墓的象首壺。新增瓣口、長頸、球形器身和喇叭形足，則可產生龍柄瓣口瓶。

新的設計模件往往來自新器形。如同紋飾，在魏晉南北朝到唐代，大量器形傳入，包含細頸瓶、胡瓶、環形壺、淨瓶、把杯、來通、扁壺、高足杯、牙盤……等等原本以貴金屬、玻璃、陶瓷等材質流行於地中海到中亞的器形，從四面八方經由不同路線，前仆後繼地以各種媒介輸入。中原陶工面對的版本有不少是已經在各個交通節點受當地工匠轉譯過的。相較於忠實模仿，陶工更常擷取元素拼裝。可以想像，中原陶工面對新的器皿造型，能藉由解構器形為設計素材庫增添新模件，也能獲得靈感，以重新選擇既有模件搭配組裝，更能利用新模件設計其他新器形。

細頸瓶就提供一組例子，此器形在魏晉南北朝東傳。¹²⁹ 從陶瓷作品的細頸、頸部與腹部的折角以及外撇的圈足這些在金屬器皿上常見但以陶瓷製作相對具挑戰性的特徵看來，陶工刻意模仿金屬製品。目前中國境內出土不少金屬器，陶工或許曾見到造型相同的金屬器，加上瓶式簡單，因此忠實複製。此外，基於細頸瓶經常作為儀式用具出現在佛教造像手中以及地宮等寺院遺跡，在墓葬中也常和長柄香爐、香寶子等器物同出，遵循一定的製作與使用規範可能也是其忠實模仿造型的原因之一。¹³⁰ 北齊河清元年（562）庫狄迴洛墓出土了金屬橄欖形細頸瓶，¹³¹ 而隋大業六年（610）豐寧公主墓隨葬的白瓷細頸瓶可說是年代稍晚但仍忠實複製的陶瓷版本。¹³²

然而，即便忠實模仿的陶瓷版本盛行，也不影響陶工解構器形以獲取模件設計新器形。美國波士頓美術館（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藏的瓣口瓶器身便提

129 謝明良，〈關於玉壺春瓶〉，收入同氏著，《陶瓷手記——陶瓷史思索和操作的軌跡》（臺北：石頭出版社，2008），頁 39-42；李靜杰、相宛升，〈棗形腹、石榴形腹細頸瓶與梨形腹束頸瓶的譜系〉，《故宮博物院院刊》，2017 年 1 期，頁 6-19。

130 張琨林，〈南北朝陶瓷與金屬工藝：以響銅為中心〉，頁 95-105。

131 王克林，〈北齊庫狄迴洛墓〉，《考古學報》，1979 年 3 期，頁 385，圖版 5。

132 韋圓照葬於唐貞觀八年（634），發掘者推測瓷瓶為豐寧公主於 610 年下葬時的隨葬。戴應新，〈隋豐寧公主與韋圓照合葬墓〉，《故宮文物月刊》，186 期（1998.9），頁 86-87、93，圖 22、23。

供一個實例。¹³³ 其器身為橄欖形，和大多數瓣口瓶為球形或梨形不同。這個差異來自不同模件選擇。工匠解構橄欖形細頸瓶，取得器身，配上擷取自外來陶瓷或者玻璃器的瓣口，替換為較高的足，再搭配上龍柄，設計出器身形狀較罕見的瓣口瓶。

以模件庫的角度來看，細頸瓶上帶喇叭口的細長頸、喇叭形高足，以及龍形與各式獸形柄壺上高過器沿後低頭銜著器口的龍與獸柄，還有常見於瓣口瓶的梨形與球形身等模件，都罕見於漢代。外來器形在魏晉南北朝到唐代傳入後，不僅提供工匠忠實模仿的範本，更提供新模件豐富了中原陶瓷模件庫。此外，工匠也在新器形的刺激下以舊模件製作新組合，既有模件與器形也可能是工匠面對新模件與新器形時的選擇依據。漢代便有以龍等神獸裝飾柄的器皿，如鏃斗、勺和魁。對這些舊器形的熟悉，可能使得工匠面對胡瓶之類帶獸柄的器形傳入時，能夠快速吸納獸銜器口的新設計，並以在本地更常見的龍形器柄反應。

這樣的器物設計思維和作坊中預製模件以便快速組裝的思維相輔相成。然而，器形的設計並非完全自由，會受到一些限制。工匠必須考慮使用者的喜好與需求，而這些往往和器形的功能、使用脈絡，甚至意義有關。由工匠本身出發，外來器形提供的組合依據、製作技術的高低、該區域在當時流行的器形與紋飾，甚至作坊傳統都會成為器形設計時的限制。相對於器形受功能限制，紋飾更自由，可是往往也受上述因素限制。此外，還有一些視覺上的安排原則。¹³⁴ 但後者牽涉層面較廣，有待未來研究。以下僅以龍柄器皿的分布和流行時間變化說明作坊帶來的區域連結與差異。

既有模件的來源除了解構新器形而得，也需考慮工匠間的傳承。近年研究指出北齊鄴城到隋唐河北南部與河南北部的相州窯再到鞏義窯，在產品組合、造型、技術上緊密連結，而大規模的人群移動是關鍵因素。¹³⁵ 這些地區都是龍柄器

133 波士頓美術館 (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 典藏號：50.1944。圖版見 “Pitcher with Ovoid Body and Dragon-Headed Handle,” 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 accessed June 24, 2025, <https://collections.mfa.org/objects/21226/pitcher-with-ovoid-body-and-dragonheaded-handle>

134 本文涉及的瓶罐與碗盤類器皿裝飾，王聰威曾歸納出視覺效果。王聰威，〈唐宋陶瓷裝飾發展的研究——以磁州窯裝飾的研究為中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頁 79-89。

135 小林仁，劉晶晶譯，〈北齊鄴城地區的明器生產及其系譜——以陶俑和低溫鉛釉陶為中心〉，收入中國古陶瓷學會編，《中國古陶瓷研究·第16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後改

皿集中出土地，也是重要的使用和生產中心。龍柄這個模件的造型相似性，包含代表寶珠的如意雲貼飾和卷鬚等都展現出上述地區的緊密關聯。即便目前對北齊晉陽的窯業了解有限，但其為北齊最重要的龍柄壺生產與使用中心，顯示晉陽工匠對隋唐窯業的發展以及對北齊鄴城的反饋不容忽視。¹³⁶ 相較之下，其他地區的龍柄卷鬚特徵不明顯。隋代湖北武漢東湖岳家嘴 M29（圖 10）為兩湖產品，龍首不帶卷鬚，僅以泥塊裝飾。¹³⁷ 被認定為安徽壽州窯產品的長豐隋墓單身盤口龍柄壺與雙身雙龍柄壺器柄上端的裝飾，要視為「龍」或其他獸類實在勉強（圖 15、18）。江蘇揚州郭莊隋墓 M2 的雞頭壺上的繫以及帶放射狀短線的小型圓狀團花都使用於江蘇泰州出土的罐（圖 12、13），然而，連同罐上的方形橋形繫，都罕見於同時代的華北。這些長江流域出土案例與上述山西、河南、河北、陝西地區之間的差異，進一步襯托出北方這幾個生產中心的關聯，而這種關聯來自工匠之間的緊密交流與傳承。

取得外來器形的機會多寡以及傳統束縛的強度都是影響陶工解構重構程度的因素。六世紀時以龍柄雞頭壺為主，模件組合單一，但在六世紀末到七世紀初，龍柄器皿種類增加，可能因為北朝末到初唐間戰亂頻仍，動盪的情勢打亂生產中心的既有範式，陶工因此有更多的探索空間。雖然大部分產品很快退流行，但產品退流行並不代表模件退流行，盛行於七世紀下半唐代的雙龍柄壺和龍柄瓣口瓶就是受到外來刺激後以舊模件再創的新設計。值得注意的是，自六世紀末，與龍柄搭配的經常是被視為有外來因素的器身模件，例如環形身、瓣口長頸、球形身等。舊模件也能組合成前代罕見的器形，例如雙龍柄壺。這些龍柄器皿最集中且樣式最多元的地點往往是重要城市，尤其是都城附近。一方面更容易取得舶來品，因此更容易獲得新模件以及新的組合規則。另一方面，這些區域作坊更具規模，模件化生產往往也更成熟。鞏義窯是唐代最具規模且模件化生產相當發達的窯場之一，因此，在外來器形與紋飾進入時，更容易以既有模件反應。

寫增補後以日文〈北齊鄴地區的明器生產とその系譜——陶俑と低火度鉛釉器を中心に〉，收入同氏著，《中国南北朝隋唐陶俑の研究》（京都：思文閣，2015），頁 196-210；李鑫，〈隋代白瓷的生產、流通與消費〉，《故宮博物院院刊》，2021 年 12 期，頁 27-39；徐斐宏，〈洛陽唐初黃釉俑試探——兼論洛陽唐初墓葬文化之淵源〉，《中原文物》，2019 年 2 期，頁 106。

136 小林仁，〈北齊鄴地區的明器生產とその系譜——陶俑と低火度鉛釉器を中心に〉，頁 206。

137 謝明良，〈雞頭壺的變遷——兼談兩廣地區兩座西晉紀年墓的時代問題〉，頁 332。

五、結論

魏晉南北朝到唐代大量新器形傳入，成爲陶工的靈感來源。在各類器形中，帶有龍柄的陶瓷器形受到矚目，以學者的溯源研究爲基礎，本文聚焦於其背後的本土化機制。各種龍柄器皿之間的關聯是探討背後機制的關鍵，尤其是過去對雞頭壺和雙龍柄壺演變關係的建構，爲分析關聯提供了立基點。本文首先分析各種龍柄器皿流行的時代與地理範圍，乃至可能的功能與象徵意義，其中，龍柄雞頭壺、雙身雙龍柄壺、雙龍柄壺等在各方面的差異顯示，三者間的興衰應是獨立事件，而非過去認爲的演變關係。反倒是過去幾乎不會被納入序列的環形壺與龍柄瓣口瓶等，分別和同時代的雞頭壺與雙龍柄壺有橫向關係，採用相同模件。因此，本文將龍柄器皿之間的關聯放回製作與設計的脈絡思考，進一步說明許多不帶龍柄的器皿其實與龍柄器皿共用模件，例如短頸罐，且龍柄本身就是可受代換的模件。這些案例說明，討論器形關聯時，除了傳統上以整體器形爲考量，也應由模件層次切入。

由模件層次進行思考有助於重新了解外來器形在陶瓷生產的在地化機制。器形可以視爲模件的組合，而許多看似關聯不大的器皿，實際上是相同模件的不同組合。魏晉南北朝到唐代，大量器形、紋飾伴隨著人群、物件、知識、信仰等傳入中原地區，成爲陶瓷產業的養分。當中許多器形可以追溯至中亞、西亞，乃至地中海地區，器形源頭可能是貴金屬、玻璃甚至是陶器，這些來自各地的器形在交通線上的各個節點上不斷跨越材質，相互模仿、改造、創新，使用脈絡與象徵意義也不斷變化。北朝到唐幾個重要的陶瓷龍柄器皿生產中心都在北齊晉陽、鄴城到唐代長安與洛陽等重要都城附近，外來人口與物品由四面八方聚集，加上物品轉手過程中的時間差，陶工所看到的外來器物可能來自多樣地區，製作於不同時代，且以不同材料與技術製作。當外來器形與紋飾傳入中土時，陶工能夠將其解構獲得新模件，之後利用新舊模件做出不同組合。不排除在個別案例，尤其是剛開始生產某種新器形時陶工以模仿爲主，但一旦有量產需求，會納入模件化生產與設計體系。整體器形不僅提供設計靈感也能化整爲零，增添新模件。新設計出的模件能夠大量預製，代換組裝成更多不同器形。藉由窯址遺存以及對物件的仔細觀察判斷，現代研究者能夠推想出有哪些模件及其樣貌，這些模件的集合，可以視爲工匠集團掌握的模件庫。當中的模件造型與組合方式可能因師徒傳承而

微調，也會隨著工匠集團的交流與移動而傳播、流轉。¹³⁸

反過來說，模件庫的流轉，也有助於了解工匠集團間的關聯。北齊鄴城與隋唐河北南部與河南北部的窯場緊密連結，這些地點也都是龍柄器皿及相關器形流行的地方。面對其他尚未發現窯址的產地，或許可以藉由觀察哪些生產中心採用樣式相似的模件來評估彼此間的可能關聯。由龍柄的例子來看，北齊龍柄器皿的集中出土地是晉陽，且晉陽的出土品極有可能都是當地產品，此案例有助於說明晉陽對隋唐河南與河北窯場發展的重要性。此外，有些區域目前相關器皿出土案例不多，但在未來研究中值得特別注意。山東的龍柄在卷鬚前端貼上一排小泥粒作為裝飾，在泰安徵集的蹲猴龍柄壺（圖 16）與兗州夏村的出土品都能看到，且能上溯到定為東魏的臨淄崔氏墓地 M7 出土的白陶螭首壺，但在其他地區罕見。¹³⁹以小泥粒裝飾卷鬚前端的做法，在河南洛陽張文俱墓與陳暉墓的雙龍柄壺上都能看到。此外，在泰安的蹲猴龍柄壺背後有乳丁，此為唐代龍柄的普遍特徵。由此看來，要能更完整地掌握唐代河南、河北及陝西的陶瓷發展，未來需要更重視和山東地區的關係。

138 黃冶窯另出土一件黑釉龍柄破片，從破片樣式判斷為執壺的提把，年代約在九世紀下半到十世紀。其帶卷鬚的獨角、背後的乳丁、低頭銜著器皿口沿的特徵均與流行於七世紀下半到八世紀的龍柄如出一轍，但龍身拱起的弧度顯然是為了配合外開的口沿，可視為不同世代微調舊模件且搭配新模件的案例。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日本奈良文化財研究所編著，《肇義黃冶窯》，頁 208、305，彩版 171 之 6。

139 張柏主編，《中國出土瓷器全集·6·山東》（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頁 37；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臨淄北朝崔氏墓〉，頁 239-240，圖版 26 之 5。

引用書目

近代論著

- 小林仁，劉晶晶譯，〈北齊鄴城地區的明器生產及其系譜——以陶俑和低溫鉛釉陶為中心〉，《中國古陶瓷研究·第16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頁505-524。
-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太原北齊徐顯秀墓發掘簡報〉，《文物》，2003年10期，頁4-40。
-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齊東安王婁叡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 山西省博物館、汾陽縣博物館，〈山西汾陽北關隋梅淵墓清理簡報〉，《文物》，1992年10期，頁23-27。
- 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臨淄北朝崔氏墓〉，《考古學報》，1984年2期，頁221-244。
- 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臨朐縣博物館，〈山東臨朐北齊崔芬壁畫墓〉，《文物》，2002年4期，頁4-20。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磁縣灣漳北朝壁畫墓》，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唐長安城郊隋唐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 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美術全集·37·工藝美術編·陶瓷（中）》，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14。
- 中野徹，孔六慶譯，〈隋唐陶瓷的紋樣〉，《陶瓷研究》，1989年6期，頁48-53。
- 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北齊徐顯秀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
- 王文強、霍保成，〈鶴壁市發現一座唐代墓葬〉，《中原文物》，1988年2期，頁32-34。
- 王克林，〈北齊庫狄迴洛墓〉，《考古學報》，1979年3期，頁377-401。
- 王聰威，〈唐宋陶瓷裝飾發展的研究——以磁州窯裝飾的研究為中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
- 北京藝術博物館編，《中國邢窯》，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12。
- 安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安陽隋代麴慶夫妻合葬墓的發掘〉，《考古學報》，2023年3期，頁393-434。
- 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西安南郊北魏北周墓發掘簡報〉，《文物》，2009年5期，頁21-49。
- 李靜杰、相宛升，〈橢形腹、石榴形腹細頸瓶與梨形腹束頸瓶的譜系〉，《故宮博物院院刊》，2017年1期，頁6-26。
- 李鑫，〈隋代白瓷的生產、流通與消費〉，《故宮博物院院刊》，2021年12期，頁27-39。

- 邢琪、張榮欣、馬天成，〈泰安地區館藏隋代瓷器選介〉，《收藏》，2021年10期，頁62-65。
- 尙剛，〈吸收與改造——6至8世紀的中國聯珠圈紋織物〉，收入趙豐、齊東方編，《錦上胡風——絲綢之路紡織品上的西方影響（4-8世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頁17-23。
- 易立，〈唐代鳳首壺雜識〉，《文物春秋》，2006年5期，頁46-51。
- 杰西卡·羅森（Jessica Rawson），張平譯，《蓮與龍：中國紋飾（Chinese Ornament: The Lotus and the Dragon）》，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9。
- 林容伊，〈唐宋陶瓷與西方玻璃器〉，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
- 林聖智，《圖像與裝飾——北朝墓葬的生死表象》，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9。
- 武漢市文物管理處，〈武漢市東湖岳家嘴隋墓發掘簡報〉，《考古》，1983年9期，頁793-798。
-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日本奈良文化財研究所編著，《鞏義白河窯考古新發現》，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
-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日本奈良文化財研究所編著，《鞏義黃冶窯》，北京：科學出版社，2016。
- 施靜菲，〈景德鎮元青花瓷之裝飾分析：宋元時期的「圖案資料庫」〉，收入上海博物館編，《幽藍神采——2012上海元青花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2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頁253-266。
- 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洛陽洛龍區潘寨村唐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22年4期，頁39-48。
- 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陽關林唐代陳暉墓發掘簡報〉，《中原文物》，2012年6期，頁4-8。
- 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唐代張文俱墓發掘報告〉，《中原文物》，2013年5期，頁4-16。
- 洛陽市考古研究院，〈河南洛陽洛龍區唐墓C7M6915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23年3期，頁29-38。
- 洛陽博物館編，《洛陽唐三彩》，鄭州：河南美術出版社，1985。
- 胡悅謙，〈談壽州瓷窯〉，《考古》，1988年8期，頁735-750。
- 徐斐宏，〈洛陽唐初黃釉俑試探——兼論洛陽唐初墓葬文化之淵源〉，《中原文物》，2019年2期，頁101-108。
- 徐巍、董健麗，〈唐代雙龍柄尊探究——以故宮博物院藏品為例〉，《故宮學刊》，2015年3期，頁220-230。

-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唐代黃堡窯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
- 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西安羊頭鎮唐李爽墓的發掘〉，《文物》，1959年3期，頁43-53。
-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南郊隋李裕墓發掘簡報〉，《文物》，2009年7期，頁4-20。
- 崔劍峰、雷勇、黃寶玲，〈河南鞏義窯和陝西黃堡窯出土唐三彩殘片釉料的鉛同位素產源研究〉，收入北京藝術博物館編，《中國鞏義窯》，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11，頁367-371。
- 張柏主編，《中國出土瓷器全集·12·河南》，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
- 張柏主編，《中國出土瓷器全集·3·河北》，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
- 張柏主編，《中國出土瓷器全集·5·山西》，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
- 張柏主編，《中國出土瓷器全集·6·山東》，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
- 張柏主編，《中國出土瓷器全集·7·江蘇、上海》，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
- 張柏主編，《中國出土瓷器全集·8·安徽》，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
- 張琨林，〈南北朝陶瓷金屬工藝：以響銅為中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9。
- 張德水主編，《安陽張盛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24。
- 淄博市博物館、臨淄區文管所，〈臨淄北朝崔氏墓地第二次清理簡報〉，《考古》，1985年3期，頁216-221。
- 陳柏泉，〈記新建隋墓出土的軍持〉，《江西歷史文物》，1985年02期，頁41-42。
- 陶正剛，〈山西祁縣白圭北齊韓裔墓〉，《文物》，1975年4期，頁64-73。
- 巽淳一郎，魏女譯，〈鉛釉陶器的多彩裝飾及其變遷〉，收入北京藝術博物館編，《中國鞏義窯》，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11，頁339-346。
- 揚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蘇揚州郭莊隋代墓葬發掘簡報〉，《東南文化》，2017年4期，頁50-60。
- 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武漢市郊周家大灣241號隋墓清理簡報〉，《考古通訊》，1957年6期，頁30-34。
- 程繼林，〈泰安舊縣出土的隋代青瓷龍柄蹲猴壺〉，《文物》，1988年8期，頁95。
- 葛承雍，〈環形壺：從地中海到大興城——西安隋墓出土環形壺(askos)藝術研究〉，《文物》，2020年1期，頁58-68。
- 董健麗，〈唐代雙龍柄尊及其相關問題〉，《中原文物》，2008年4期，頁60-63、112。
- 董健麗，〈唐雙龍柄尊〉，《文物世界》，2005年4期，頁49-52。
- 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張總等譯，《萬物：中國藝術中的模件化和規模化生產(Ten Thousand Things: Module and Mass Production in Chinese Art)》，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

- 磁縣文化館，〈河北磁縣北齊高潤墓〉，《考古》，1979年3期，頁234-243。
- 趙康民，〈臨潼唐慶山寺舍利塔基精室清理記〉，《文博》，1985年5期，頁12-37、99-100。
- 趙德雲，〈從雞頭壺到龍柄壺的發展：兼析外來文化因素在這一過程中的作用〉，《考古與文物》，2007年1期，頁95-102。
- 千年邢窯編輯委員會編著（趙慶鋼、張志忠主編），《千年邢窯》，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
- 趙豐，〈隋唐絲綢上的團窠圖案〉，《故宮文物月刊》，160期，1996年7月，頁14-21。
- 齊東方，〈唐代銅器皿簡論〉，《文博》，2005年2期，頁33-37。
- 齊東方，〈輸入·模仿·改造·創新——粟特器物與中國文化〉，收入榮新江、張志清編，《從撒馬爾干到長安——粟特人在中國的文化遺跡》，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頁27-40。
- 齊東方、申秦雁主編，《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遺寶精粹》，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 鄭州文物考古研究院、鄭州考古博物館，〈鞏義城西變電站唐墓發掘簡報〉，《文物春秋》，2011年3期，頁28-34。
- 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鞏義芝田晉唐墓葬》，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
- 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鞏義芝田唐墓發掘簡報〉，《文物春秋》，2013年2期，頁11-20、81。
- 穆青，〈青瓷、白瓷、黃釉瓷——試論河北北朝至隋代瓷器的發展演變〉，收入河北省邢台市文化管理處編著（石從枝、李軍、李恩瑋、王睿主編），《邢台隋代邢窯》，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頁325-337。
- 龜井明德（龜井明德），王淑津譯，〈隋唐龍耳瓶的形式與年代〉，《美術史研究集刊》，6期，1999年3月，頁43-69。
- 戴應新，〈隋豐寧公主與韋圓照合葬墓〉，《故宮文物月刊》，186期，1998年9月，頁76-93。
- 謝明良，〈唐俑札記——想像製作情境〉，收入同氏著，《陶瓷手記3：陶瓷史的地平與想像》，臺北：石頭出版社，2015，頁221-234。
- 謝明良，〈唐咸亨年（670-674）的陶瓷景觀〉，《故宮學術季刊》，42卷1期，2024年秋季，頁1-42。
- 謝明良，〈龍與龍珠〉，原載《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52期，2022年3月，收入同氏著，《陶瓷手記5：中國陶瓷的器形、紋飾與圖像》，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23，頁83-130。
- 謝明良，〈雞頭壺的變遷——兼談兩廣地區兩座西晉紀年墓的時代問題〉，收入同氏著，《六朝陶瓷論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社，2006，頁325-355。

- 謝明良，〈關於玉壺春瓶〉，收入同氏著，《陶瓷手記——陶瓷史思索和操作的軌跡》，臺北：石頭出版社，2008，頁 33-51。
- 謝明良，〈關於唐代雙龍柄壺〉，原載《故宮文物月刊》，278 期，2006 年 5 月，後改寫收入同氏著，《陶瓷手記——陶瓷史思索和操作的軌跡》，臺北：石頭出版社，2008，頁 53-74。
- 魏女，〈西安北魏韋氏紀年墓出土瓷器及相關問題探討〉，《考古與文物》，2020 年 3 期，頁 92-95。
- 羅森 (Jessica Rawson)，〈中亞銀器及其對中國瓷器的影響〉，收入同氏著，《中國古代的藝術與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頁 241-257。
- 羅豐、曹中俊，〈甘肅武威慕容智墓中的胡瓶與葡萄酒〉，《文物》，2024 年 7 期，頁 55-69。
- セゾン美術館、日本經濟新聞社編，《長安の秘宝：シルクロードの都：日中国交正常化 20 周年記念》，東京：セゾン美術館、日本經濟新聞社，1992。
- 河野道房，〈北齊婁叡墓壁畫考〉，收入礪波護編，《中國中世の文物》，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93，頁 137-180。
- 小林仁，〈北齊鄴地区の明器生産とその系譜——陶俑と低火度鉛釉器を中心に〉，《中国南北朝隋唐陶俑の研究》，京都：思文閣，2015，頁 196-217。
- 千賀久、林部均編，《遣唐使が見た中国文化：奈良・藤原京建都千三百年》，四日市：四日市市立博物館，1995。
- 相賀徹夫編，《世界陶磁全集・11・隋・唐》，東京：小學館，1976。
- 中野徹，〈隋唐陶磁の紋様〉，收入相賀徹夫編，《世界陶磁全集・11・隋・唐》，東京：小學館，1976，頁 290-299。
- 朝日新聞社、大広編，《唐三彩展：洛陽の夢》，大阪：大広，2004。
- 龜井明德，〈北朝—隋・初唐期罐・瓶の編年的研究〉，收入同氏著，《中国陶瓷史の研究》，東京：六一書房，2014，頁 51-78。
- 龜井明德，〈隋唐期竜耳瓶の形式と年代〉，收入同氏著，《中国陶瓷史の研究》，東京：六一書房，2014，頁 119-146。
- 龜井明德，〈隋唐弁口瓶・鳳首瓶・銀瓶の形式と年代〉，收入同氏著《中国陶瓷史の研究》，東京：六一書房，2014，頁 186-202。
- Chen, Yi. "Chapter Seven: Platters with Teeth and Ewers Lifted from One Side: New Vessel Forms and Foodways in Tang China (618-907)." In *Visual, Material and Textual Cultures of Food and Drink in China, 200 BCE-1900 CE*, edited by Stacey Pierson, 184-237. Newcastle upon Tyn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22.
- Krahl, Regina. "Reflections of Roman Glass in Tang Ceramics," *Journal of Inner Asian Art and Archaeology* 2 (2007): 89-192.

- Ledderose, Lothar. *Ten Thousand Things: Module and Mass Production in Chinese Art*.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 Medley, Margaret. *The Chinese Potter: A Practical History of Chinese Ceramics*. Oxford: Phaidon, 1980.
- Jessica Rawson, 林容伊、許涵譯,〈由內象外:7-8世紀的唐代中國對於異國風格的造作〉,《典藏·讀天下·古美術》,6期,2014年9月,頁58-65。
- Rawson, Jessica. “Central Asian Silver and its Influence on Chinese Ceramics.”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5 (1991): 139–151.
- Rawson, Jessica. “Inside Out: Creating the Exotic within Early Tang Dynasty China in the Seven and Eighth Centuries,” *World Art* 2 (2012): 25–45.
- Rawson, Jessica. *Chinese Ornament: The Lotus and the Dragon*. New York: Holmes & Meier Publishers, 1984.
- Rawson, Jessica. *The Ornament on Chinese Silver of the Tang Dynasty (AD 618-906)*. London: The British Museum, 1982.
- Vainker, Shelagh. *Chinese Pottery and Porcelain*. London: The British Museum, 2005.
- Watson, William. *Tang and Liao Ceramics*.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4.

網路資料

- 〈三彩印花飛鳥文三足盤〉,《国立文化財機構所藏品統合検索システム》https://colbase.nich.go.jp/collection_items/tnm/TG-675?locale=ja, 檢索日期 2025 年 6 月 23 日。
- 〈三彩印花蓮花文三足盤〉,《国立文化財機構所藏品統合検索システム》https://colbase.nich.go.jp/collection_items/tnm/TG-677?locale=ja, 檢索日期 2025 年 6 月 23 日。
- 〈三彩貼花宝相華文壺〉,《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収藏品検索》https://jmapps.ne.jp/mocoor/det.html?data_id=9, 檢索日期: 2025 年 6 月 23 日。
- 〈三彩貼花龍耳瓶〉,《国立文化財機構所藏品統合検索システム》https://colbase.nich.go.jp/collection_items/tnm/TG-647?locale=ja, 檢索日期 2025 年 6 月 24 日。
- 〈漆胡瓶〉,《正倉院宝物検索》<https://shosoin.kunaicho.go.jp/treasures?id=0000010145&index=22>, 檢索日期: 2025 年 5 月 10 日。
- The British Museum. “Dish.” Accessed June 22, 2025. https://www.britishmuseum.org/collection/object/A_1947-0712-27?selectedImageId=1613335417.
- The British Museum. “Ewer.” Accessed June 22, 2025. https://www.britishmuseum.org/collection/object/A_1936-1012-209?selectedImageId=339589001.
- 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 “Ewer.” Accessed June 24, 2025. <https://www.clevelandart.org/art/1987.148>.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Jar with Floral Medallions." Accessed June 24, 2025. <https://www.artic.edu/artworks/12242/jar-with-floral-medallions>.

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 "Pitcher with Ovoid Body and Dragon-Headed Handle." Accessed June 24, 2025. <https://collections.mfa.org/objects/21226/pitcher-with-ovoid-body-and-dragonheaded-handle>.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Tray." Accessed June 23, 2025. <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44348>.

Ashmolean Museum. "White Ware Amphora with Handles in the Form of Dragons." Ashmolean Museum. Accessed June 22, 2025. <https://collections.ashmolean.org/object/358446>.

圖版出處

- 圖 1a 雙龍柄壺，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1b 雙龍柄壺，局部，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2 瓣口瓶，河南鞏義城西變電站出土。圖版取自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鄭州博物館，〈鞏義城西變電站唐墓發掘簡報〉，《文物春秋》，2011 年 3 期，頁 33，圖 8 之 3。
- 圖 3 龍柄雞頭壺，陝西西安隋大業四年（608）李靜訓墓出土。圖版取自千年邢窯編輯委員會編著（趙慶鋼、張志忠主編），《千年邢窯》，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頁 59。
- 圖 4 雙身雙龍柄壺，陝西西安隋大業四年（608）李靜訓墓出土。圖版取自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美術全集·37·工藝美術編·陶瓷（中）》，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14，頁 8。
- 圖 5 環形壺，河南新鄉出土，河南博物院藏。筆者攝。
- 圖 6 象首壺，河南安陽隋開皇十五年（595）張盛墓出土。圖版取自張柏主編，《中國出土瓷器全集·12·河南》，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圖 30。
- 圖 7 三繫盤口龍柄壺，山西太原隋開皇十五年（595）梅淵墓出土。圖版取自張柏主編，《中國出土瓷器全集·5·山西》，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圖 30。
- 圖 8 龍柄雞頭壺，山西太原北齊武平二年（571）徐顯秀墓出土。圖版取自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北齊徐顯秀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頁 57，圖 44。
- 圖 9 石門額正面線刻龍柄雞頭壺線繪圖，河南安陽隋開皇十年（590）麴慶墓出土。圖版取自安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安陽隋代麴慶夫妻合葬墓的發掘〉，《考古學報》，2023 年 3 期，圖 4。
- 圖 10 龍柄雞頭壺，湖北武漢東湖岳家嘴 M29 出土。圖版取自武漢市文物管理處，〈武漢市東湖岳家嘴隋墓發掘簡報〉，《考古》，1983 年 9 期，圖版 3 之 2。
- 圖 11 龍柄雞頭壺，江蘇揚州郭莊隋墓 M1 出土。圖版取自揚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蘇揚州郭莊隋代墓葬發掘簡報〉，《東南文化》，2017 年 4 期，封 3 之 2。
- 圖 12 龍柄雞頭壺，江蘇揚州郭莊隋墓 M2 出土。圖版取自揚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蘇揚州郭莊隋代墓葬發掘簡報〉，《東南文化》，2017 年 4 期，封 3 之 5。
- 圖 13 劃花十繫罐，江蘇泰州出土。圖版取自張柏主編，《中國出土瓷器全集·7·江蘇、上海》，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圖 63。
- 圖 14 龍柄雞頭壺，安徽無為出土。圖版取自張柏主編，《中國出土瓷器全集·8·安徽》，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圖 53。
- 圖 15 龍柄盤口壺，安徽長豐出土。圖版取自胡悅謙，〈談壽州瓷窯〉，《考古》，1988 年 8 期，圖版 6 之 1。

- 圖 16 蹲猴龍柄壺，山東泰安舊縣徵集。圖版取自邢琪、張榮欣、馬天成，〈泰安地區館藏隋代瓷器選介〉，《收藏》，2021 年 10 期，圖 1。
- 圖 17 雙身雙龍柄壺，河南洛陽宮城遺址出土。圖版取自千賀久、林部均編，《遣唐使が見た中国文化：奈良・藤原京建都千三百年》，四日市：四日市市立博物館，1995，頁 65，圖 47。
- 圖 18 雙身雙龍柄壺，安徽省博物館藏。圖版取自胡悅謙，〈談壽州瓷窯〉，《考古》，1988 年 8 期，圖版 6 之 5。
- 圖 19 環形壺，陝西西安東郊昆侖社區十六街坊建設工地隋代夫妻合葬墓出土。筆者攝。
- 圖 20 龍柄盤口壺，河北石家莊出土。圖版取自張柏主編，《中國出土瓷器全集·3·河北》，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圖 21。
- 圖 21 雞頭壺，陝西西安唐總章元年（668）李爽墓出土。圖版取自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西安羊頭鎮唐李爽墓的發掘〉，《文物》，1959 年 3 期，圖 20。
- 圖 22 瓣口瓶，陝西西安三橋村出土。圖版取自セゾン美術館、日本經濟新聞社編，《長安の秘宝：シルクロードの都：日中国交正常化 20 周年記念》，東京：セゾン美術館、日本經濟新聞社，1992，圖 32。
- 圖 23 I 式雞頭壺，山西太原北齊武平元年（570）婁叡墓出土。圖版取自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齊東安王婁叡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彩版 140。
- 圖 24 II 式雞頭壺，山西太原北齊武平元年（570）婁叡墓出土。圖版取自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齊東安王婁叡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彩版 141 之 1。
- 圖 25 長頸貼花寶裝壺，山西太原北齊武平元年（570）婁叡墓出土。圖版取自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齊東安王婁叡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彩版 143 之 2。
- 圖 26 圓蓋貼花寶裝壺，山西太原北齊武平元年（570）婁叡墓出土。圖版取自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齊東安王婁叡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彩版 143 之 1。
- 圖 27 I 式釉陶燈，山西太原北齊武平元年（570）婁叡墓出土。圖版取自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齊東安王婁叡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彩版 138 之 1。
- 圖 28 貼花壺，山西太原徐顯秀墓（571）出土。圖版取自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北齊徐顯秀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頁 58，圖 45。
- 圖 29 貼花燈，山西太原北齊武平二年（571）徐顯秀墓出土。圖版取自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北齊徐顯秀墓》，頁 55，圖 41。

- 圖 30 雙龍柄壺（編號 HM1940：2），河南洛陽唐咸亨元年（670）張文俱墓出土。圖版取自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唐代張文俱墓發掘報告〉，《中原文物》，2013 年 5 期，彩版 4 之 40。
- 圖 31 雙龍柄壺（編號 HM1940：1），河南洛陽唐咸亨元年（670）張文俱墓出土。圖版取自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唐代張文俱墓發掘報告〉，《中原文物》，2013 年 5 期，彩版 4 之 41。
- 圖 32 雙龍柄壺，河南洛陽唐咸亨元年（670）陳暉墓出土。圖版取自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陽關林唐代陳暉墓發掘簡報〉，《中原文物》，2012 年 6 期，封 3 之 10。
- 圖 33 龍柄殘件，河南鞏義白河窯出土。圖版取自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日本奈良文化財研究所編著，《鞏義白河窯考古新發現》，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圖 132。
- 圖 34 龍柄殘件，河南鞏義白河窯出土。圖版取自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日本奈良文化財研究所編著，《鞏義黃冶窯》，北京：科學出版社，2016，彩版 30 之 2。
- 圖 35 帶蓋平口圓唇折沿瓷罐，河南洛陽唐咸亨元年（670）張文俱墓出土。圖版取自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唐代張文俱墓發掘報告〉，《中原文物》，2013 年 5 期，彩版 4 之 42。
- 圖 36 帶蓋斂口罐，河南洛陽唐咸亨元年（670）張文俱墓出土。圖版取自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唐代張文俱墓發掘報告〉，彩版 4 之 43。
- 圖 37a 三彩雙龍柄壺，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圖版取自国立文化財機構所藏品統合検索システム：https://colbase.nich.go.jp/collection_items/tnm/TG-647?locale=ja，檢索日期 2025 年 6 月 24 日。
- 圖 37b 三彩雙龍柄壺，局部，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圖版取自国立文化財機構所藏品統合検索システム：https://colbase.nich.go.jp/collection_items/tnm/TG-647?locale=ja，裁切，檢索日期 2025 年 6 月 24 日。
- 圖 38a 三彩瓣口瓶，日本天理大學附屬天理參考館藏。圖版取自天理大學、天理教道友社編，《ひとものこころ・隋唐の文物》，天理：天理教道友社，1988，頁 46，圖 19。
- 圖 38b 三彩瓣口瓶，局部，日本天理大學附屬天理參考館藏。圖版取自天理大學、天理教道友社編，《ひとものこころ・隋唐の文物》，頁 47，圖 19（部分）。
- 圖 39 三彩瓣口瓶，美國克里夫蘭藝術博物館（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藏。圖版取自 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https://www.clevelandart.org/art/1987.148>，檢索日期：2025 年 6 月 24 日。
- 圖 40 貼花三彩罐，美國芝加哥藝術博物館（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藏。圖版取自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https://www.artic.edu/artworks/12242/jar-with-floral-medallions>，檢索日期：2025 年 6 月 24 日。

- 圖 41 貼花三彩罐。圖版取自相賀徹夫編，《世界陶磁全集·11·隋·唐》，東京：小學館，1976，頁 49，圖 33。
- 圖 42 貼花三彩罐，河南洛陽金家溝出土。圖版取自洛陽博物館編，《洛陽唐三彩》，鄭州：河南美術出版社，1985，圖 71。
- 圖 43 釉樽，河南鞏義黃冶窯出土。圖版取自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日本奈良文化財研究所編著，《鞏義黃冶窯》，北京：科學出版社，2016，彩版 56 之 3。
- 圖 44 素燒樽，河南鞏義黃冶窯出土。圖版取自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日本奈良文化財研究所編著，《鞏義黃冶窯》，北京：科學出版社，2016，彩版 83 之 5。
- 圖 45 三足爐，河南鞏義黃冶窯出土。圖版取自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日本奈良文化財研究所編著，《鞏義黃冶窯》，北京：科學出版社，2016，彩版 125 之 1。
- 圖 46 三足爐，河南鞏義黃冶窯出土。圖版取自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日本奈良文化財研究所編著，《鞏義黃冶窯》，北京：科學出版社，2016，彩版 125 之 2。
- 圖 47 三足爐，河南鞏義黃冶窯出土。圖版取自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日本奈良文化財研究所編著，《鞏義黃冶窯》，北京：科學出版社，2016，彩版 125 之 3。
- 圖 48 三足爐，河南鞏義黃冶窯出土。圖版取自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日本奈良文化財研究所編著，《鞏義黃冶窯》，北京：科學出版社，2016，彩版 125 之 4。
- 圖 49a 寶相花紋三彩洗，河南洛陽洛龍區潘寨村唐墓 M2371 出土。圖版取自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洛陽洛龍區潘寨村唐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22 年 4 期，封 3 之 1。
- 圖 49b 寶相花紋三彩洗線繪圖，河南洛陽洛龍區潘寨村唐墓 M2371 出土。圖版取自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洛陽洛龍區潘寨村唐墓發掘簡報〉，頁 47，圖 29 之 1。
- 圖 50 寶相花紋三彩洗（HIT9H79：35），河南鞏義黃冶窯出土。圖版取自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日本奈良文化財研究所編著，《鞏義黃冶窯》，北京：科學出版社，2016，彩版 62 之 1。
- 圖 51 寶相花紋三彩三足盤，日本永青文庫藏。圖版取自相賀徹夫編，《世界陶磁全集·11·隋·唐》，東京：小學館，1976，頁 75，圖 54。
- 圖 52 墓門彩繪線繪圖，山西太原北齊武平元年（570）婁叡墓出土。圖版取自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齊東安王婁叡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圖 64。

- 圖 53a 素燒團窠紋洗 (IT1 ⑨ : 176), 河南鞏義黃冶窯出土。圖版取自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日本奈良文化財研究所編著,《鞏義黃冶窯》,北京:科學出版社,2016,彩版 80 之 3。
- 圖 53b 素燒團窠紋洗線繪圖 (IT1 ⑨ : 176), 河南鞏義黃冶窯出土。圖版取自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日本奈良文化財研究所編著,《鞏義黃冶窯》,北京:科學出版社,2016,圖 81 之 4。
- 圖 54a 素燒團窠紋洗 (IT1 ⑨ : 170), 河南鞏義黃冶窯出土。圖版取自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日本奈良文化財研究所編著,《鞏義黃冶窯》,北京:科學出版社,2016,彩版 80 之 2。
- 圖 54b 素燒團窠紋洗線繪圖 (IT1 ⑨ : 170), 河南鞏義黃冶窯出土。圖版取自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日本奈良文化財研究所編著,《鞏義黃冶窯》,北京:科學出版社,2016,圖 81 之 3。
- 圖 55 寶相花紋三彩洗 (IT1 ⑨ : 69), 河南鞏義黃冶窯出土。圖版取自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日本奈良文化財研究所編著,《鞏義黃冶窯》,北京:科學出版社,2016,彩版 61 之 2。
- 圖 56 寶相花紋三彩洗 (IIIT9H79 : 3), 河南鞏義黃冶窯出土。圖版取自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日本奈良文化財研究所編著,《鞏義黃冶窯》,北京:科學出版社,2016,彩版 62 之 2。
- 圖 57 飛鳥紋三彩三足盤, 1975 年鞏義北窯段子溝出土。圖版取自洛陽博物館編,《洛陽唐三彩》,鄭州:河南美術出版社,1985,圖 92。
- 圖 58 飛鳥紋三彩三足盤, 1972 年洛陽關林變電站出土。圖版取自洛陽博物館編,《洛陽唐三彩》,鄭州:河南美術出版社,1985,圖 94。
- 圖 59 飛鳥紋三彩三足盤,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圖版取自国立文化財機構所藏品統合檢索システム : https://colbase.nich.go.jp/collection_items/tnm/TG-675?locale=ja, 檢索日期 2025 年 6 月 23 日。
- 圖 60 三彩三足盤,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圖版取自国立文化財機構所藏品統合檢索システム : https://colbase.nich.go.jp/collection_items/tnm/TG-677?locale=ja, 檢索日期 2025 年 6 月 23 日。
- 圖 61 寶相花紋三彩三足盤, 陝西臨潼慶山寺塔基地宮出土。圖版取自陳安利編,《中華國寶:陝西珍貴文物集成:唐三彩卷》,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頁 79 右下。
- 圖 62 寶相花紋三彩三足盤。圖版取自相賀徹夫編,《世界陶磁全集·11·隋·唐》,東京:小學館,1976,頁 79。
- 圖 63 寶相花紋三彩三足盤, 美國大都會博物館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藏。圖版取自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 <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44348>, 檢索日期: 2025 年 6 月 23 日。

- 圖 64 鑲金鴛鴦紋銀盒，正面，陝西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圖版取自齊東方、申秦雁主編，《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遺寶精粹》，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頁 194。
- 圖 65 鑲金翼鹿鳳鳥紋銀盒，底面，陝西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圖版取自齊東方、申秦雁主編，《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遺寶精粹》，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頁 132。
- 圖 66 鴛鴦蓮瓣紋金碗碗心線繪圖，陝西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圖版取自齊東方、申秦雁主編，《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遺寶精粹》，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頁 113。
- 圖 67 鑲金花鳥紋銀碗，陝西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圖版取自齊東方、申秦雁主編，《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遺寶精粹》，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頁 258。
- 圖 68 鑲金蔓草鴛鴦紋銀羽觴，陝西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圖版取自齊東方、申秦雁主編，《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遺寶精粹》，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頁 254。

Modules in the Production of Ceramics from the Northern Dynasties to the Tang Dynasty: The Case of Dragon-Handled Vessels*

Lin, Chun-I**

Abstract

Vessels with dragon-shaped handles are significant from the time of the Northern Dynasties period to the Tang dynasty and are often regarded as symbols of cultural exchange. Previous research has traced their origins, and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ir connections to each other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ir development in medieval China.

The first two sections of the article investigate the connections among the vessels with dragon-shaped handl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ir period of manufacture, distribution, and possible functions and meanings. The linear evolutionary trajectory from chicken-head ewers to vases with two dragon handles is discussed in particular. Following this, the article draws on Lothar Ledderose's concept of modular systems to re-examine these vesse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nufacture and design, with a view to revealing that many vessel types which in the past were only rarely considered as relating to dragon-handled wares do in fact use the same modules. It is argued that, stimulated by foreign vessel designs, potters recombined existing modules to produce the forms. With the arrival of foreign forms, potters deconstructed them and produced new modules which became part of their repertoire. These were subsequently combined with older ones to create new forms. This mode of production and design suggests that the study of morphological relationships should move beyond whole-form comparisons to an analysis at the modular level, accounting for processes of multiple de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By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dragon-handled vessels

* Received: 26 June 2025; Accepted: 16 January 2026

** Assistant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Art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nd related types, this approach offers insights into the mechanisms of localization in cultural interaction and invites reflection on the tendency to impose linear evolutionary narratives on ceramic forms.

Keywords: vessels with dragon handles, ceramics, modules, workshops, localization, Gongyi kilns



圖 1a 雙龍柄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b 雙龍柄壺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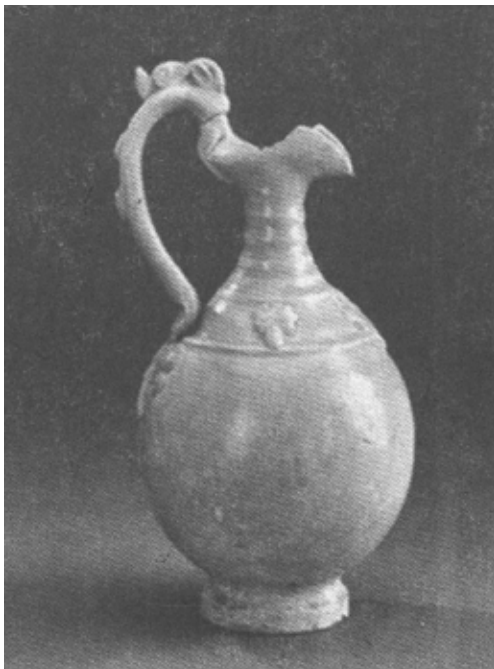


圖 2 瓣口瓶 河南鞏義城西變電站出土



圖 3 龍柄雞頭壺 陝西西安隋大業四年（608）李靜訓墓出土



圖4 雙身雙龍柄壺 陝西西安隋大業四年
(608) 李靜訓墓出土



圖5 環形壺 河南新鄉出土 河南博物院藏



圖6 象首壺 河南安陽隋開皇十五年(595)
張盛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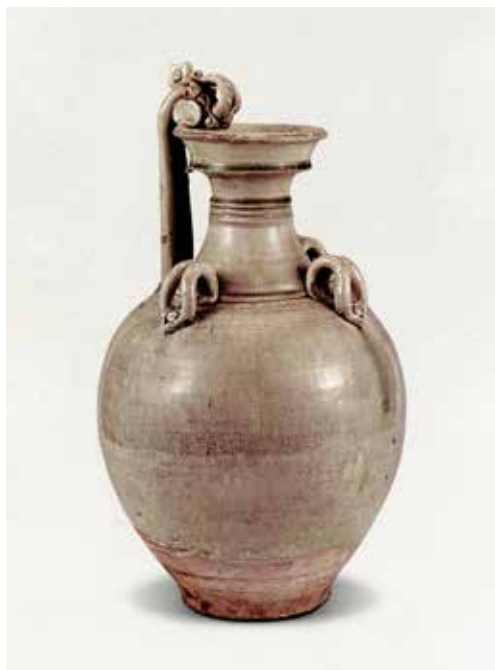


圖7 三繫盤口龍柄壺 山西太原隋開皇十五年
(595) 梅淵墓出土



圖 8 龍柄雞頭壺 山西太原北齊武平二年
(571) 徐顯秀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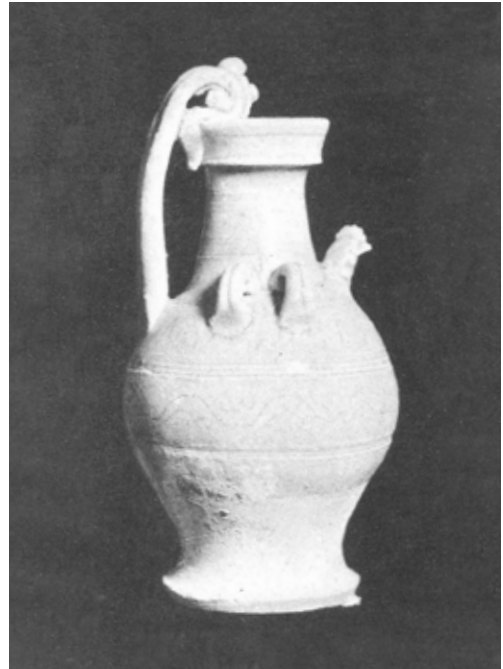


圖 10 龍柄雞頭壺
湖北武漢東湖岳家嘴 M29 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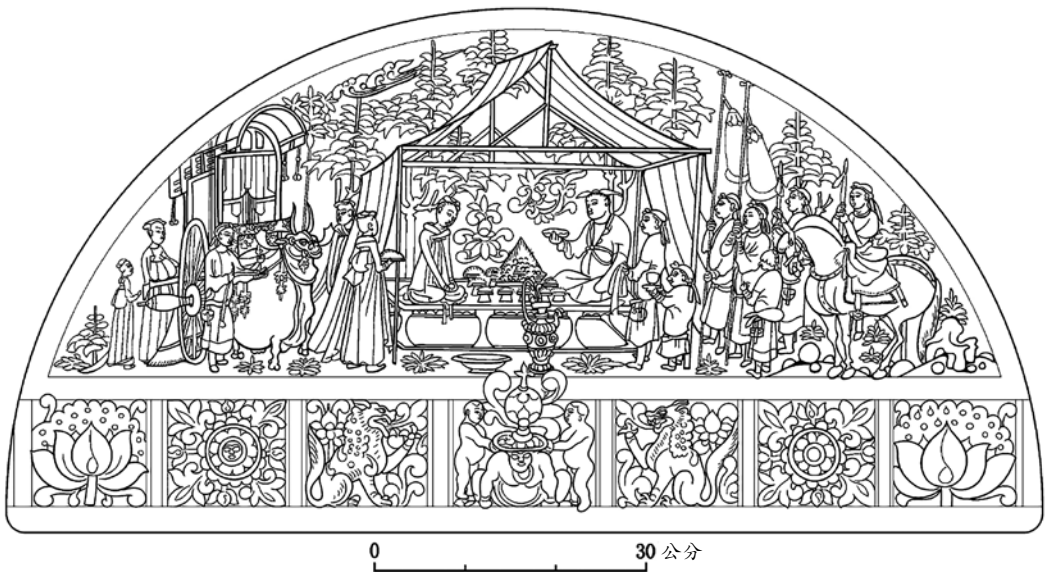


圖 9 石門額正面線刻龍柄雞頭壺線繪圖，河南安陽隋開皇十年（590）鮑慶墓出土



圖 11 龍柄雞頭壺 江蘇揚州郭莊隋墓 M1 出土



圖 12 龍柄雞頭壺 江蘇揚州郭莊隋墓 M2 出土



圖 13 劃花十繫罐 江蘇泰州出土



圖 14 龍柄雞頭壺 安徽無為出土



圖 15 龍柄盤口壺 安徽長豐出土



圖 16 蹲猴龍柄壺 山東泰安舊縣徵集



圖 17 雙身雙龍柄壺 河南洛陽宮城遺址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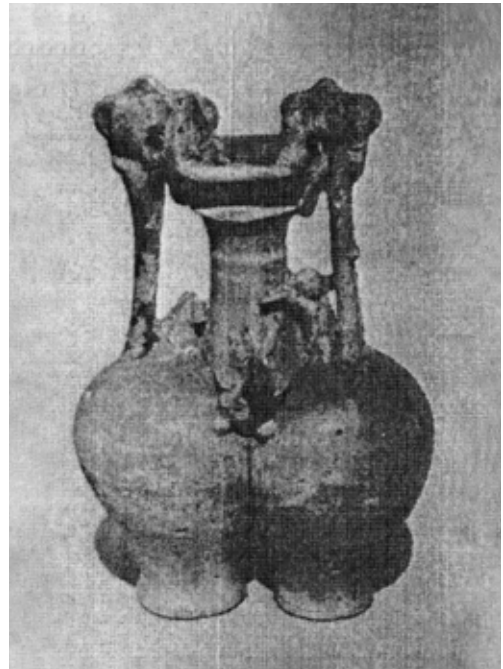


圖 18 雙身雙龍柄壺 安徽省博物館藏



圖 19 環形壺 陝西西安東郊昆侖社區十六街坊建設工地隋代夫妻合葬墓出土



圖 20 龍柄盤口壺 河北石家莊柳辛莊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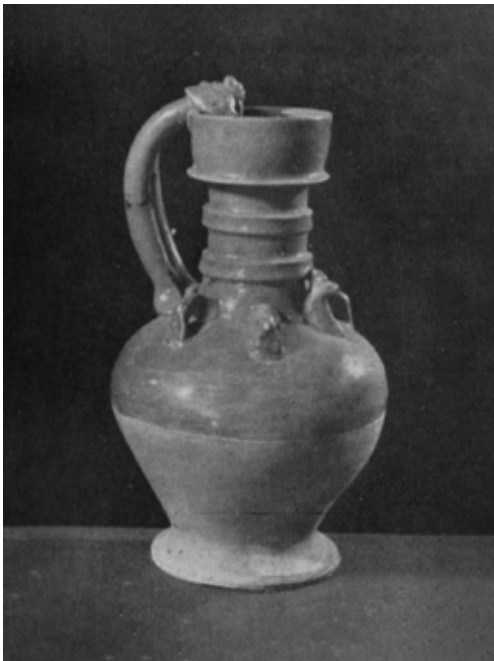


圖 21 雞頭壺 陝西西安唐總章元年（668）李爽墓出土



圖 22 瓣口瓶 陝西西安三橋村出土



圖 23 I 式雞頭壺 山西太原北齊武平元年
(570) 婁叡墓出土



圖 24 II 式雞頭壺 山西太原北齊武平元年
(570) 婁叡墓出土



圖 25 長頸貼花寶裝壺 山西太原北齊武平
元年(570) 婁叡墓出土



圖 26 圓蓋貼花寶裝壺 山西太原北齊武平
元年(570) 婁叡墓出土



圖 27 I 式釉陶燈 山西太原北齊武平元年
(570) 婁叡墓出土



圖 28 貼花壺 山西太原北齊武平二年 (571)
徐顯秀墓出土



圖 29 貼花燈 山西太原北齊武平二年 (571)
徐顯秀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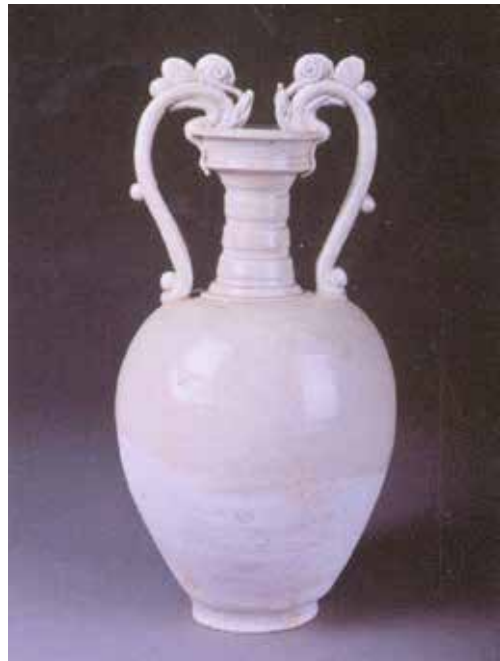


圖 30 雙龍柄壺 (編號 HM1940:2) 河南
洛陽唐咸亨元年 (670) 張文俱墓出土



圖 31 雙龍柄壺（編號 HM1940：1） 河南洛陽唐咸亨元年（670）張文俱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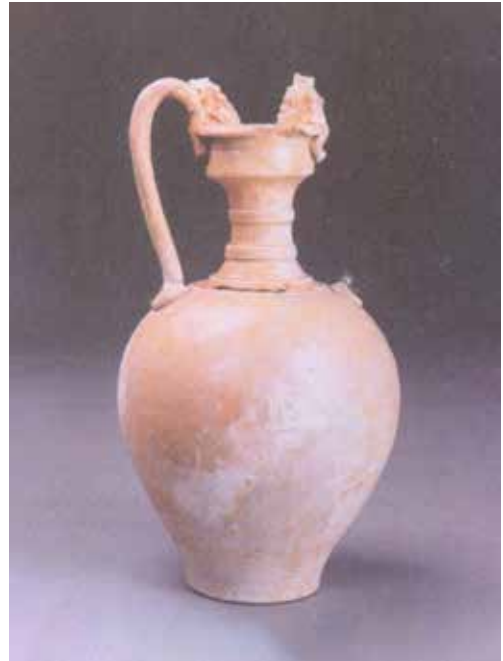


圖 32 雙龍柄壺 河南洛陽唐咸亨元年（670）陳暉墓出土



圖 33 龍柄殘件 河南鞏義白河窯出土



圖 34 龍柄殘件 河南鞏義黃冶窯出土



圖 35 帶蓋平口圓唇折沿瓷罐 河南洛陽唐咸亨元年（670）張文俱墓出土



圖 36 帶蓋斂口瓷罐 河南洛陽唐咸亨元年（670）張文俱墓出土



圖 37a 三彩雙龍柄壺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圖 37b 三彩雙龍柄壺 局部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圖 38a 三彩瓣口瓶
日本天理大學附屬天理參考館藏



圖 38b 三彩瓣口瓶龍柄 局部
日本天理大學附屬天理參考館藏



圖 39 三彩瓣口瓶 美國克里夫蘭藝術博物館
(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 藏



圖 40 貼花三彩罐 美國芝加哥藝術博物館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藏



圖 41 貼花三彩罐



圖 42 貼花三彩罐 河南洛陽金家溝出土



圖 43 釉樽 河南鞏義黃冶窯出土



圖 44 素燒樽 河南鞏義黃冶窯出土



圖 45 三足爐 河南鞏義黃冶窯出土



圖 46 三足爐 河南鞏義黃冶窯出土



圖 47 三足爐 河南鞏義黃冶窯出土



圖 48 三足爐 河南鞏義黃冶窯出土



圖 49a 寶相花紋三彩洗 河南洛陽洛龍區潘寨村唐墓 M2371 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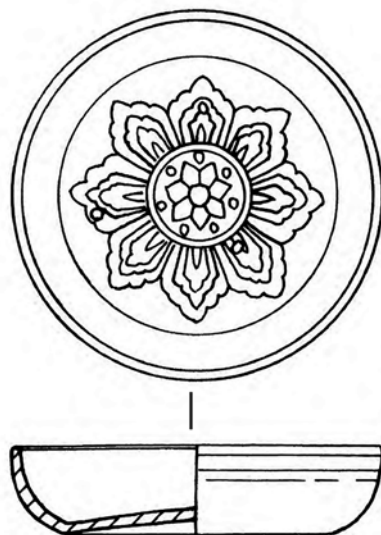


圖 49b 寶相花紋三彩洗線繪圖 河南洛陽洛龍區潘寨村唐墓 M2371 出土



圖 50 寶相花紋三彩洗（標本 IIIIT9H79：35） 河南鞏義黃冶窯出土



圖 51 寶相花紋三彩三足盤 日本永青文庫藏



圖 52 墓門彩繪線繪圖 山西太原北齊武平元年(570)婁叡墓出土



圖 53a 素燒團窠紋洗 (IT1 ⑨ : 176)
河南鞏義黃冶窯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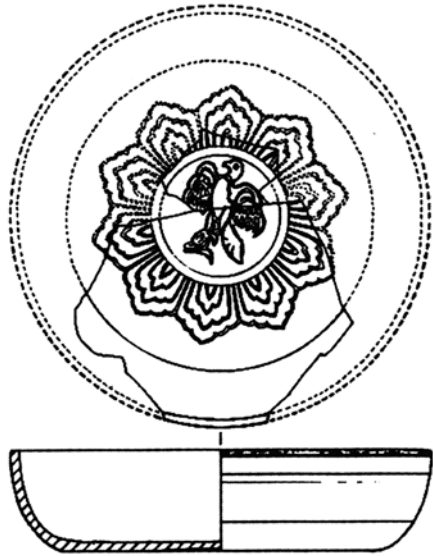


圖 53b 素燒團窠紋洗 (IT1 ⑨ : 176) 線繪圖
河南鞏義黃冶窯出土



圖 54a 素燒團窠紋洗 (IT1 ⑨ : 170)
河南鞏義黃冶窯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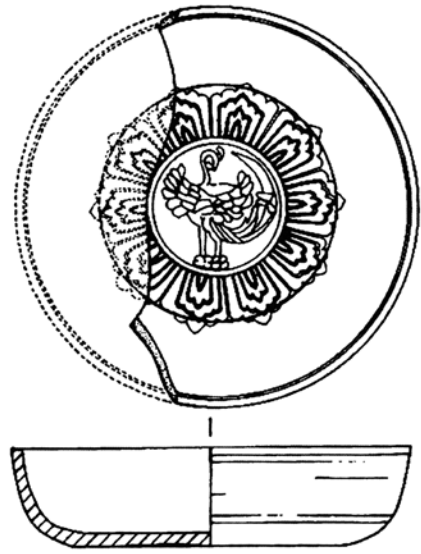


圖 54b 素燒團窠紋洗 (IT1 ⑨ : 170) 線繪圖
河南鞏義黃冶窯出土



圖 55 寶相花紋三彩洗 (標本 IT1 ⑨ : 69)
河南鞏義黃冶窯出土



圖 56 三彩洗 (標本 IIIIT9H79 : 3)
河南鞏義黃冶窯出土



圖 57 飛鳥紋三足盤
1975 年鞏義北窯段子溝出土



圖 58 飛鳥紋三足盤
1972 年洛陽關林變電站出土



圖 59 飛鳥紋三彩三足盤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圖 60 三彩三足盤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圖 61 寶相花紋三彩三足盤 陝西臨潼慶山寺塔基地宮出土



圖 62 寶相花紋三彩三足盤



圖 63 寶相花紋三彩三足盤
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



圖 64 鑲金鴛鴦紋銀盒 正面
陝西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



圖 65 鑲金翼鹿鳳鳥紋銀盒 底面
陝西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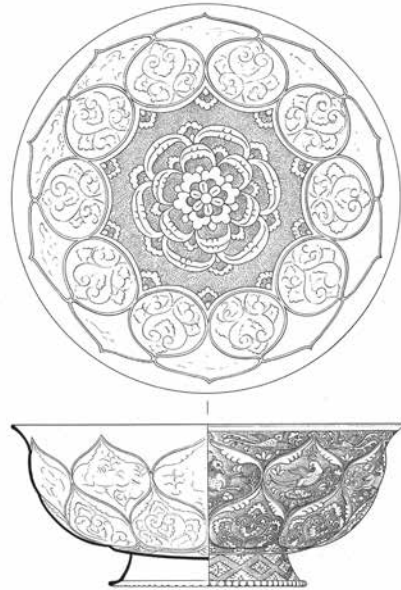


圖 66 鴛鴦蓮瓣紋金碗碗心線繪圖
陝西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



圖 67 鑲金花鳥紋銀碗
陝西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



圖 68 鑲金蔓草鴛鴦紋銀羽觴
陝西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